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48 期
2012 年 12 月，頁 281-326

巴頓案與亨利八世的言論控制

李若庸*

摘要

本文是「英格蘭宗教改革」研究之延續對話。迄今的研究成果強調「合作」為亨利八世朝「官方宗教改革」成功的原因，本文主張在「合作」的面向外，英格蘭社會亦曾對亨利八世的改革政策發出過反對之聲。「肯特郡的聖女」伊莉莎白．巴頓在一五三〇年前後發表的「政治預言」就是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巴頓修女從肯特郡的一隅，透過教會、鄉誼等人際網絡，以口語及文字的形式，將她的反對預言穿越地域、階級，與性別地傳播出去，形成一股強大的異議之聲。亨利八世不久針對巴頓預言展開強力的整肅：除了巴頓與周邊人士被國王處決，所有與巴頓接觸過的關聯人士都遭到傳訊。亨利八世在「巴頓案」的處置展現了他對民間言論的高度掌握與控制。「掌握於事前，嚴懲於事後」，亨利八世對所有異議言論有效地打擊，使它們難以形成撼動王朝的力量。巴頓案展現了英格蘭民間的反對聲音，但也解釋了亨利八世王朝宗教改革的成功。

關鍵詞：伊莉莎白．巴頓、肯特郡的聖女、政治預言、言論控制、亨利朝宗教改革

---

*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感謝國科會之專題研究計畫補助（97-2410-H-305-025-MY3），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精闢的建議。本人已於正文與注釋中依據審查意見提出修正與補充說明。

一、前言

本論文是「英格蘭宗教改革」（the English Reformation）辯論的延續對話。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r.1509-1547）在一五三〇年代為解除與王后凱撒琳（Catherine of Aragon,1485-1536）的婚姻關係，脫離羅馬（Break with Rome），自立為英格蘭教會領袖，史稱「英格蘭宗教改革」。「英格蘭宗教改革」因為是由國王的婚姻問題所引發的「改宗運動」（conversion），是以與歐陸的宗教改革運動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它是一個由「政治問題」而非「信仰問題」啟動，「由上而下」（reformation from above）的改宗運動。這項差異造成了此項運動特有的辯論傳統：亦即，由「國王婚姻問題」此一「政治事件」所引發的改革運動，在「何時」、「透過何種機制」，轉變成為人民信仰改宗的「宗教事件」？

學界經過了半世紀的辯論至今得到一個基本共識：那就是，英格蘭的宗教改革應該分為「官方宗教改革」（official reformation）以及「民間宗教改革」（popular reformation）兩個層次來理解。「官方宗教改革」指的是英格蘭透過國王與國會立法，建立由國王為首的「英格蘭國教會」（the Anglican Church）；而「民間宗教改革」是英格蘭社會放棄傳統信仰，接受新教教義的「改宗」運動。前者關切「教會組織」的改立，後者強調「信仰內容」的轉變。這兩種改革不僅在內涵上有所差距，在完成的時間點上也有先後之別：「官方宗教改革」大約在亨利八世時達成，但「民間改宗運動」卻遲至伊莉莎白時代（Elizabeth I, r.1558-1603）甚至更晚才塵埃落定。[1]

---

[1] 「官方宗教改革」與「民間宗教改革」在英格蘭宗教改革的辯論傳統中是相對產生的概念。當 A.G. Dickens 在一九五〇年代末以約克郡為題開啟英格蘭的宗教改革研究時，並沒有這樣的區分。Dickens 主張宗教改革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改宗運動，由國王啟動，獲得民間熱烈的迴響，英格蘭在亨利八世朝很快便蛻變「完成」為一個新教國家，此之謂宗教改革的「成功」。Dickens 的看法在七〇年代面臨「修正派」學者（如 J.J. Scarisbrick、Christopher Haigh 等人）的挑戰。他們提出「『民間』宗教改革」的概念，藉此區隔由亨利八世主導，「改立國王為教會領袖」的「（官方）宗教改革」。「民間」與「官方」這兩個對比的詞彙自此進入英

學界的共識釐清了此辯論最核心的問題：「英格蘭的宗教改革究竟於何時完成？」然而進一步探究我們可以發現，此項結論在邏輯上存在著內部的矛盾：亦即，英格蘭如何可能在缺乏「民間宗教改革」的基礎上完成「官方宗教改革」？更淺白地說：亨利八世如何能在英格蘭大部份民眾仍信奉羅馬天主教會的情勢下，建立起獨立的英格蘭國教會？這兩種改革間的時間落差需要被解決。[2]

關於這個問題，學界已有部分的觀察，目前以「合作論」（cooperation）的解釋為主流。「合作論」強調「官方宗教改革」的成功為官民協力的結果：亨利八世或者運用英格蘭社會（尤其是「士紳階級」）特有的「忠誠」與「順服」文化，輔以國王的權威讓人民靜默，[3]又或者利用「社會矛盾」、「經濟利誘」等非宗教因素，攏絡人們支持國教會的建立。[4]「合作論」的立論基礎是英

格蘭宗教改革的辯論，並逐漸發展出「先官方、後民間」的宗教改革兩階段論。「官方宗教改革」因此指的就是「亨利朝宗教改革」（Herician Reformation），亦即，建立（或改制為）以國王為首的英格蘭教會（Church of England）。見 Dickens,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1964; 2nd edn., London, 1982). Roger B. Manning, "The Spread of the Popular Reformation in England," *Sixteenth Century Essays and Studies*, vol.1 (Jan., 1970), pp. 35-52. Robert Whiting, *The Blind Devotion of the People: Popular Religion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Scarisbrick,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English People* (Oxford, 1984). Haigh, *English Reformation: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the Tudors* (Oxford, 1993). 關於宗教改革的辯論傳統，見李若庸，〈評 Peter Marshall, The Impact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1500-1640〉，《新史學》，9：4（臺北：1998.12），頁171-177。

2 Alec Ryrie 曾指出，日耳曼宗教改革提供了英格蘭宗教改革有利的推動條件，他特別側重外交（diplomatic）、國內盟友（domestic allies），以及意識型態（ideology）等三項因素。Ryrie 的論點可以補充本論文的背景條件。見 Ryrie, *The Age of Reformation: the Tudor and Stewart Realms 1485-1603* (Pearson Longman, 2009), pp. 120-129. 關於歐陸政治情勢與亨利朝宗教改革的關係，本人曾以 Reginald Pole 樞機主教的出使有過討論，見李若庸，〈十六世紀歐洲強權間的外交角力〉，帝國之禮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2009.1）。

3 J.P.D. Cooper, *Propaganda and the Tudor State: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Westcoun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參見李若庸，〈評 J.P.D. Cooper, Propaganda and the Tudor State: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Westcountry〉，《新史學》，16：4（臺北，2005.12），頁221-230。

4 Ethan H. Shagan,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參見李若庸，〈評 Ethan H. Shagan,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新史學》，14：3（臺北，2003.9），頁183-191。

格蘭社會並未強烈抗拒過亨利八世的「官方宗教改革」，而這樣立論的歷史依據是，亨利八世朝除了一五三六年曾出現規模較大的「聖寵朝聖行」（Pilgrimage of Grace）「請願」運動外，並沒有具有威脅力的反抗行動出現。「合作論」強調「官民協力」促成了亨利朝「官方宗教改革」的成功。[5]

「合作論」的立論有其證據與啟發，但它「柔化」了亨利八世的新教改革運動：「官民合作」固然成就了部分政策的順利推動，但「官民衝突」卻是不能漠視的歷史現象。無法大規模組織反抗行動或者發出強烈的抗議之聲，可能不是出自人民的心悅順服，而是由於國王的高壓箝制。事實上，當時代的書信、司法檔案，以及修院解散記錄，每每展現亨利八世在遭遇反對意見時殘酷的整肅：他運用各種管道向異議菁英施壓；[6]以威脅逮捕，乃至斬首處決的方式迫使全英格蘭的修院解散；他利用人民間的互相偵防，箝制可能危及政權的言論。種種跡象顯示，「合作」與「鎮服」雙管齊下才是亨利八世新教改革成功的關鍵。無法忠實呈現國王在改革過程中展現的強悍面容，就不能真正理解「官方宗教改革」的最終成功。本文便是在這樣的立論前提上以「政治預言」（political prophecy）為題，以「巴頓案」為例，揭櫫改革當時英

---

[5] 所謂「成功」的定義，雖然可能有部分保留意見，但學界大致接受 Dickens 的論點，認為英格蘭於亨利朝已「完成」第一階段的改革。至於改革為英格蘭帶來的外交威脅與內部鬥爭，我傾向將之認定為官方改革的「餘波」，而非「未竟」。我的主要理由是，這些內外因素都未曾威脅到亨利八世國教會的存續（關於當時的國際局勢，請見李若庸，〈十六世紀歐洲強權間的外交角力〉）。而國教會在教階與教義上保留相當多天主教的內涵，並不能被視為「改革尚未完成」的依據，因為在相當程度上，這就是英格蘭國教會的定位（直至今日，國教會（聖公會）仍保有主教制），就如同路德教會與喀爾文教會在「揚棄」天主教的傳統上也有差別，卻不能因此認定其中的一個教會「改革未竟」。此外，「國王至高權」（royal supremacy）的設立是重大的變革，因為它的背後牽涉到「教權」與「政權」正統性（legitimacy）的神學爭議（例如，王權是直接授自於上帝抑或透過教會取得）。對於許多知識菁英而言，這是無可妥協的信仰立場，John Fisher、Thomas More 等人更不惜以身護道（參見李若庸，〈忠君或虔信？知識菁英與亨利八世的對抗及妥協〉，《成大歷史學報》，第38期（臺北，2010.6），頁53-88。）從亨利八世度過重重危機來保全（新）國教會的角度評價，將亨利朝宗教改革定義為「成功」，我想是可以接受的。

[6] 參見李若庸，〈忠君或虔信？〉，頁59-82。

格蘭社會流傳的異議之聲，並透過亨利政府在言論控制上的強勢作為，展現此運動長期為學界所忽視的「鎮服」面向。[7]

「肯特郡的聖女」(The Holy Maid of Kent）在一五三〇年前後的「政治預言」是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她的預言不僅在民間普遍流傳，還引起政治菁英，甚至亨利八世本人的關切。肯特郡的聖女預言顯示英格蘭民間存在著自主的反對聲音，這種聲音透過各種人際網絡的連結，突破地域、階級與性別的界限，形成具備規模的民間輿論。本文將透過巴頓影響力的構築、巴頓預言的傳播，以及湯瑪斯．摩爾爵士（Sir Thomas More,1478-1535）的遭遇為例，揭示民間輿論的力量以及亨利八世對言論的控制。

二、「肯特郡聖女」的政治預言

伊莉莎白．巴頓（Elizabeth Barton,c.1506-1534）在歷史上被稱為「肯特郡的修女」(the Nun of Kent)，天主教會命之為「肯特郡的聖女」，而亨利政府的官方文獻則將她定位為欺瞞大眾的「騙

---

[7] 關於亨利八世的言論控制，雖然屢被學者提及，但令人驚訝的是至今幾乎未見系統的討論。舉例來說，本文所討論的「政治預言」在一五三〇年代相當盛行，它對亨利八世政權形成威脅，也成為亨利政府打擊的重點。然而真正以此為研究主題的只有 Sharon L. Jansen 等少數學者。Jansen 在 1991 年出版 *Political Protest and Prophecy under Henry VIII*（Woodbridge, Suffolk, UK ; Rochester, NY, USA : Boydell Press, 1991）一書，探討「政治預言」的問題。Jansen 將一五三〇年代的民間「政治預言」，視為對亨利八世表達抗議的方式。Jansen 在 1996 年又出版了 *Dangerous Talk and Strange Behavior: Women and Popular Resistance to the Reforms of Henry VIII*（London, Macmillan, 1996）一書。此書延續她之前的研究，將眼光擴及女性，在基本論點上沒有太大的改變。Jansen 之後，Diane Watt 編纂了一本討論女性預言者的論文集：*Secretaries of God: Women Prophets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Woodridge: D.S. Brewer, 1997)。此書處理中古以來的四名女性，其中的 Elizabeth Barton 與 Anne Askew 屬於亨利八世時代，與本研究所關切的主題相關。不過 Watt 較關切的是性別、非國教信仰、以及口語及書寫文化的問題。簡言之，在「政治預言」的研究上，Jansen 與 Watt 都是以民間（尤其是女性）輿論的角度出發，著重在預言的文本分析，缺乏對預言傳播及影響力的探討，也完全沒有提及亨利八世對於相關言論的掌握與壓制。補充一提的是，David Loades 在 1991 年出版個人論文集 *Politics, Censorship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London: Printer, 1991）。從標題看，此書與本文關切的「言論箝制」議題關係密切，但 Loades 的專長在 Mary Tudor 時代，是以他所關懷的是一五五五年 Mary 所發佈的「逮捕異端命令」在言論箝制上的影響，與本文的焦點並不相同。

徒」(impostor)。[8]巴頓因為「聲稱」獲得神啟(revelations),[9]向國王提出警告而遭到處決,但她也博得天主教會的崇敬。

巴頓的早年無從考究。依據同鄉人士德威茲(Edward Thwaites)在一五二七年撰寫的《近來發生在街埕的不可思議事蹟》(*A Marvelous Work of Late Done at Court-of-Strete*)書中的說法,巴頓是位出身貧寒的孤女。她大約在一五〇六年前後出生,沒有家人,也沒有親友。[10]

---

[8] 巴頓的相關研究與資料,最為完整的是 Alan Neame, *The Holy Maid of Kent: The Life of Elizabeth Barton, 1506-1534*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1)。另外也可參考 J.R. McKee, *Dame Elizabeth Barton, O.S.B., the Holy Maid of Kent*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London, 1925),不過此書的內容大多已經被 Neame 參考過。至於比較零散的記載可見 John Harris, *History of Kent* (London, 1719), vol.1, pp. 24-25. A. Denton Cheney, "The Holy Maid of Kent,"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8 (1904), pp. 107-129. John Strype, *Ecclesiastical Memorials*(London: Joyn Wyat, 1721), vol.1, pp. 174-176. William Lambarde, *A Preambulation of Kent: Conteining the Description, Hystories of That Shire* (1570; rpt. London, 1826), pp. 170-175. *Statutes of the Realm*, (London, 1810-1828), vol.3, pp. 446-451. L.E. Whatmore, "*The Sermon against the Holy Maid of Kent and her Adherent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58 (1943), pp. 463-475. 近來關於巴頓的研究,在討論亨利朝宗教改革時偶會提及,但以此為主題的討論不多,主要為單篇論文或專書中的章節,Ethan H. Shagon 是較重要的學者。他的"Print, Orality and Coummunications in the Maid of Kent Affair"一文討論巴頓預言如何透過文字與口語網絡傳播出去,藉此說明其影響力的建構。Shagon 在文中特別強調中古「聖徒傳」(medieval hagiography)傳統在巴頓樹立聲望過程的重要性。他在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一書的第二章亦專文討論巴頓案。此書主要從亨利八世政治操作的角度剖析國王如何度過改革過程中的危機。從這樣的角度出發,Shagon 延續前述論文的基礎,說明亨利八世透過「毀損巴頓名譽」(discredit)的宣傳,讓巴頓失去聖女光環,藉此瓦解其影響力,化解危機。G.W. Bernard 亦在其書中以特定章節討論巴頓。他的主要關懷是巴頓預言的真偽,以及其背後是否存在「集團式」的政治陰謀。見 Bernard, *The King's Reformation: Henry VIII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English Church*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ter 2. Shagon, "Print, Orality and Coummunications in the Maid of Kent Affair," *Journal of Eccleciastical History*, 52 (2001), pp. 21-33.

[9] 巴頓預言的真假仍有疑問,因此暫以「聲稱」名之。詳請見本文結論。

[10] *A Marvelous Work of Late Done at Court-of-Strete* 一書一般相信是 Edward Thwaites 在一五二七年寫作、出版。肯特郡的仕紳 Thwaites 後來受到巴頓的牽連下獄,不過最後被釋放。A Marvelous Work 一書已亡佚,但伊莉莎白時代的古籍商(antiquary)William Lambarde 將部分內容收在其著作 *A Preambulation of Kent*. 後文提到 Lambarde 版本寫道肯特郡集結近三千人圍觀巴頓的「靈魂出竅」,指的就是 Lambarde 書中收錄的 Thwaites 記載。不過 Ethan Shagon 對於 Thwaites 是否即為 *A Marvelous Work* 的作者持保留態度。他認為 Thwaites 可能只是傳抄者,當時有多個版本在坊間流傳。見 Shagon, "Print, Orality and Communications in the Maid of Kent

巴頓的「傳奇」肇始於一五二五年的一場大病。未滿二十歲的她當時在坎特伯里大主教韋漢（William Warham,c.1450-1532）的地產管理人（steward）寇伯（Thomas Cobb）家中幫佣。那一年的復活節她突然罹患怪病，病勢又急又兇，幾乎奪走生命，但她也在病中發出了第一次的預言。德威茲寫道：

> 大約在復活節之時（四月十六日）……一位名為伊莉莎白．巴頓的年輕女性……遭遇了一場大病，好幾次，病症往上發展到她的咽喉，嚴重地腫脹，讓她感到極度痛苦，旁人覺得她所經歷的就是死亡本身，直到症狀消退……就這樣，她有七個月或者更長的時間，斷續地發作。最後，在十一月的時候（當時主人家一名病重的幼兒被安置在她身旁的搖籃中），正經歷新一波發作的她（在巨大的疼痛與呻吟中）詢問，「孩子去世了沒有?」負責照護他倆的看護回答：「沒有。」她回應道：「他很快就會走。」話說完沒多久，那孩子就吐了口大氣，靈魂隨之離開了軀體。她的預言能力首次為她贏得旁觀者的敬畏。[11]

巴頓透過預言主人家幼兒的夭亡首度展現其特殊的能力。因為這場大病，她開始踏上了預言者的道路。[12]

《聖經》中有許多關於先知的記載，天主教會也有預言者的傳統。然而，預言能力究竟源自於「白魔法」（white magic）的上帝，抑或「黑魔法」（black magic）的撒旦，需要經過嚴謹的教會認證。巴頓的事蹟很快便傳遍整個堂區（parish）。[13]堂區神父麥斯特（Richard Master）依照教會規定，向坎特伯里大主教上報：「這位伊莉莎白．巴頓在病中說了些崇高且引人注目之事，旁聽

Affair," pp. 22-29. 關於 Lambarde 的生平，可參考 Retha M. Warnicke, *William Lambarde: Elizabethan Antiquary 1536-1601* (London, 1973). Wilbur Dunkel, *William Lambarde, Elizabethan Jurist 1536-1601* (New Brunswick, 1965).

[11] Lambarde, *A Perambulation of Kent*, pp. 170-171.

[12] Jansen, *Dangerous Talk and Strange Behavior*, pp. 42-43.

[13] 巴頓所在的堂區名為 Aldington，在肯特郡，隸屬坎特伯里大主教的管轄。

者大為驚訝。」大主教指示麥斯特，「徹夜守在旁邊，（將巴頓所言）詳細記錄下來。」[14]

巴頓在生病期間不斷看見「異象」（visions），發出預言，其中又以和她自己療病相關的談話最令人印象深刻。巴頓表示，她必須在某特定日子前往位於「街埕」的聖母堂（Chapel of Our Lady），在那裡透過上帝及聖母的力量獲得療癒。[15]病篤的巴頓如言前往聖母堂，並且「奇蹟似」地漸漸康復！

巴頓神奇的復原引起了大主教高度的重視，他依照慣例派遣神職人員前往巴頓居住的阿靈頓（Aldington）檢驗其「靈魂出竅」（trances）的真偽。驗證工作在聖母堂舉行，時值八月二十五日的「聖母升天節」（The Feast of the Assumption）。[16]調查團來訪的消息很快就傳遍鄉里。[17]依據蘭巴德（William Lambarde,1536-1601）的版本，現場大約聚集了近三千名的人眾（亨利政府的官方說法是兩千人）。這在寧靜的肯特郡鄉間是件轟動大事。而巴頓也「不負眾望」：她在踏進聖母堂後不久，便「在聖母座像前陷入不可思議的狂喜狀態（marvellous passion），像是被外靈附體般，開始發出雜亂卻押韻的辭語。」[18]

> 她的臉驚人地扭曲著，她的舌頭外露；她的眼睛像是被摘出，擱放在腮幫子上。從她的腹部出現一個聲音，像是從酒桶中發出，然而她的嘴唇並沒有太大的動作。整個「靈魂出竅」的狀態延續了三個多小時。

巴頓「腹中的聲音」談及「天國的歡樂」時，聲音甜美，猶若天

---

[14] Whatmore, “The Sermon against the Holy Maid of Kent and Her Adherents,” p. 465. 亦見 Jansen, *Dangerous Talk and Strange Behavior*, p. 43.

[15] 此座聖母堂大約距離 Aldington 兩英哩。Whatmore, “The Sermon against the Holy Maid of Kent and Her Adherents,” p. 465.

[16] 此日期有特別意義。由於巴頓宣稱是被聖母療癒，所以在與聖母相關的節日裡她的感應特別強烈。

[17] 調查團的主要成員除了大主教身邊的主計官（controller）沃爾（Thomas Wall）之外，還有兩位來自坎特伯里「基督堂」的僧侶，柏金以及哈得萊（William Hadley）。

[18] Lambarde, *A Perambulation of Kent*, p. 173.

籟，「在場者皆陶醉其中」；但這個聲音論說到地獄的可怕時，講得「如此恐怖、駭人，讓聽聞者都深感畏懼。」在預言中，巴頓肯定天主教會的朝聖、彌撒，與告解，而當異象終了，「她又回復為自己，完好無缺。」[19] 巴頓的表現擄獲了所有在場人士的心，再也沒有人懷疑她曾經看見「異象」，蒙受「神啟」，巴頓自此成為天主教會正式認可的預言者。前來驗證的「基督堂」（Christ Church）修士柏金（Edward Bocking）隨後將她引薦至坎特伯里的「聖墓女修道院」（St. Sepulchre's of Canterbury）當修女，負責她的信仰教育。

巴頓成為教會認可的預言者後頻繁地發出預言：她「幾乎每星期，至多每兩星期」就會看到異象。[20]由於與聖母存在著特殊的淵源（在「聖母堂」獲得治癒），因此每到十二月八日的「聖母受孕節」（The Conception of the Blessed Virgin），她就會產生強烈感應，甚至出現婦女懷孕時的不適症狀，無法進食，猶如身受聖母孕育聖子的懷胎之苦。然而令旁觀者驚異的是，巴頓即使飽受折磨，滴食不進，仍然能夠存活下來。

巴頓的預言能力使她的聲名遠播，逐漸累積起社會影響力。[21] 依據後來的坎特伯里大主教克蘭默（Thomas Cranmer,1489-1556）的記錄：[22]

> 人們在她身上投射了極為完美的想像，國內的各樣人士，身分有高有低，也有不少飽學之人，但尤其是各種宗教人

---

[19] Henry Jenkyns, *The Remains of Thomas Cranmer, D.D.,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Oxford, 1833), vol.1, pp. 79-84. Whatmore, "The Sermon against the Holy Maid of Kent and Her Adherents," p. 466.

[20] Jenkyns, *The Remains of Thomas Cranmer*, vol.1, p. 80.

[21] 對於巴頓以一介孤女卻能凝聚龐大的影響力，Ethan Shagon 認為這大部分要歸功於中古的「聖徒傳」傳統。如《黃金傳奇》（*The Golden Legend*）這類記述聖徒殉道事蹟的文類，在宗教改革期間被援用來宣揚理念。巴頓「神蹟」因為以此種成熟文類為載體，是以輕易為人們所接受，形成風潮。Shagon, "Print, Orality and Communications in the Maid of Kent Affair", pp. 28-29. 亦見 Shagon,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pp. 64-65, 74-75.

[22] Warham 在 1532 年去世，亨利八世隨即拔擢克蘭默繼任，成為推動離婚案與宗教改革的重要推手。與巴頓相關的資料後來由負責審判的克蘭默彙整。

> 士，都對她極為信賴，經常向她求教，與她互動緊密，希望透過她獲悉上帝的意旨。[23]

巴頓的「預言者生涯」在一五二八年出現重大轉折。這一年，亨利八世有意離棄凱撒琳的傳言甚囂塵上，巴頓的預言內容也從宗教事務延伸至政治議題。她的首次政治預言大約在一五二八年的十月出現，示警的對象是當時主政的「烏爾西樞機主教」（Cardinal Thomas Wolsey,1473-1530）。那一年，韋漢大主教不尋常地寫信給烏爾西，表示巴頓這位「博人好感的貞潔女性」堅持求見。[24]據說巴頓告訴烏爾西，「他手上握有三把劍（指三樣武器）」，要求他善加運用，阻止亨利八世的離婚作為。巴頓後來向烏爾西傳告了第二次的預言；她跟烏爾西表達神譴，預言他的失勢：

> 天使命她去見該位樞機主教，告知他即將垮臺，因為他並未完成上帝透過她[指巴頓]所傳遞的意旨。[25]

在巴頓發出預言後不久，烏爾西就失去亨利八世的信任。他在一

---

[23] Jenkyns, *The Remains of Thomas Cranmer*, vol.1, p. 80. 巴頓的聲名遠播，連流亡在歐陸的新教改革家庭戴爾（William Tyndale，1492-1536）都聽聞其名。他在一五二八年出版的《一位基督徒的服從》（*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書中，抨擊巴頓的預言不是「造假」（feigned）就是「魔鬼的傑作」（the work of the devil）。庭戴爾力主破除教會的儀式與神蹟傳統，不認同巴頓的預言本屬當然。但他當時流亡在英吉利海峽彼岸的安特沃普（Antwerp），以前輩神學家的身份，遠在海外，竟然對未受過正規教育、無法識字的巴頓修女出言批判，可見巴頓的聲名已引起廣泛的注意。Jansen, *Dangerous Talk and Strange Behavior*, p. 45.

[24] J. S. Brewer, J. Gairdner & R. H. Brodie (ed.), *Letters and Papers, Foreign and Domestic,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21 vols. and addenda (London: Longman & Co., 1862-1932), vol.4:2, no.4806.（以下稱為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25] Thomas Wright, *Three Chapters of Letters Relating to the Suppression of Monasterie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Camden Society by John Bowyer Nichols and Son, 1843), p.15. Wright（1810-1877）為英國著名的作家與古物學家。*Three Chapters* 一書是 Wright 為一八三八年成立於倫敦的 Camden Society 編纂的文獻集。Camden Society 專門出版英國早期的歷史與文學資料。Wright 此書蒐羅散置在國家檔案館（當時稱為 Public Record Office，今改為 National Archives）、大英圖書館等地，與英格蘭宗教改革（尤其是解散修院）相關的史料。本書的資料主要集中在1534-1540年，雖然不算齊全，但可信度高，是經常被學界引用的重要史料集。

五二九年被捕，隔年死在獄中。

巴頓的「政治預言」不僅針對朝中的大臣，也指向亨利八世。據說巴頓曾經見過亨利八世三次，第一次也是在一五二八年前後。巴頓表示，她見到天使現身，命她覲見國王傳達訊息：

> 命令修女去見國王……告訴他：「我命令他改過遷善」，遠離三件他所鍾意之事；亦即，不從教皇手中拿取他的權利與財產；其次，消滅近來持異議的這些傢伙，以及他們關於「新學」（new learning）的作品；第三，如果他結婚並且迎娶安為妻，上帝的報復將會降災其身。[26]

巴頓的示警意在阻止亨利八世「謀取」教廷權力、支持新教「異論」、以及迎娶安．葆琳（Anne Boleyn, c.1501/1507-1536）為妻，亦即，巴頓的預言反對國王近來的種種作為。

在第一次晉見的幾個月後，亨利八世又再傳召巴頓。[27]同時出席的還有巴頓的修女院院長以及僕人。巴頓在會晤中再度傳遞神意；她表示：天使再次現身，要求她向國王示警，告訴他，「上次與陛下會面後，他〔指亨利八世〕更處心積慮地要將計畫付諸實行」，顯示國王並未將警告放在心上。天使要她再次告誡，他的一切作為，上帝都看在眼裡。[28]

在這次的召見中，當事人的葆琳似乎也在現場。她與亨利以及自己的母親「威特郡伯爵夫人」（Countess of Wiltshire）分別提出了攏絡巴頓的條件：亨利提議讓巴頓接掌修女院，葆琳主張讓巴頓留在宮中，而「威特郡夫人」表示，巴頓不僅應該留在宮裡，還可以隨侍葆琳，成為親信。[29]巴頓拒絕了所有的建議，而國王也沒有留難她，讓她平安地離開。

巴頓的第三次覲見發生在一五三二年。這一年，亨利八世迎

---

[26] Wright, *Three Chapters of Letters*, pp. 14-15.

[27] 此次的會面較為公開，選在王室位於「漢沃斯」（Hanworth）的宅第。「漢沃斯」在倫敦東北方的諾弗克郡（Norfolk）北部。

[28] Wright, *Three Chapters of Letters*, pp. 14-15.

[29]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6, no.1468(5).

娶葆琳的態度轉趨積極；他在十月時帶著葆琳前往加萊（Calais），國內盛傳兩人將在那裡完婚。這樁婚姻的反對者面臨了成敗的關鍵，而就在此時，巴頓發出了第三次的警示預言。這次的預言較以往更為直接且嚴厲，她語帶威脅地向亨利八世表示：

> 神對於我們的統治君主極為不悅……倘使他不停止該項離婚計畫，堅持再娶，那麼在這項婚姻締結的一個月內，他將不再是這個國家的國王，並且，奉全能的上帝之名，多一天，甚至多一個小時，也不可能。他的下場將與惡棍無異。[30]

巴頓這次的警示非同小可，她談論的是王位的顛覆：亨利八世如不停止目前的作為，將會失去他的王位以及國家。

巴頓的第三次預言已不止是一般的示警，而是點名威嚇，甚至煽動叛亂。巴頓預言亨利八世即將失去王位，這對不滿國王作為的人是莫大的鼓舞：擁有「神啟聖女」的背書，則反叛國王不僅成功的機會大增，而且解除了宗教與道德上的枷鎖，他們不必服從「失去神恩」的國王。[31]巴頓這次預言的傷害遠遠超越先前，亨利八世不再緘默坐視。

國王在一五三三年七月展開行動。他讓新任的大主教克蘭默召喚巴頓前來審訊，巴頓最後雖被斥回，但此舉的警告意味濃厚。[32]局勢到了九月有了重大變化：葆琳在九月七日產下王嗣，可惜不是亨利殷殷企盼的王子，而是後來成為女王的伊莉莎白公主（Elizabeth I）。亨利原本對葆琳產下男嗣深具信心，認為所有的流言與威脅將因小王子的誕生而消失殆盡。然而事與願違，葆琳產下女嗣，各方的反對力量又再蠢蠢欲動。為確保王位安穩無

---

[30] 25 Henry VIII, c.12. (見 *Statutes of the Realm*, vol.3, p. 449.)

[31] 關於服從的神學討論，參見李若庸，〈英格蘭宗教改革後的服從論述〉《臺大歷史學報》，第36期（臺北，2005.12），頁317-356。

[32]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6, no. 869. 克蘭默的動作顯然是出於克倫威爾與亨利國王的指示。見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6, no. 887.

虞，亨利八世決定動手整肅。[33]

巴頓與其「同黨」（accomplices）[34]就在這樣的氛圍下於九月中旬被捕，他們被遣送至倫敦塔獄接受密集審問。這個消息很快便傳遍全國，甚至驚動了遠在歐陸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 1500-1558）。查理派駐英格蘭的大使喬比（Eustace Chapuys, 1489-1556）向他的主人報告巴頓於西敏寺公開受審的情形：

> 國王召集了主要的法官以及許多宗教與世俗貴族，花了三天的時間，從早到晚，商討修女與她的擁護者所犯下的罪狀及迷信行為。漫長的磋商結束後……大法官（chancellor）對著來自王國各郡的公眾做了一番演說，講述……這名修女與她的同黨的可恨惡謀，意圖鼓動民眾起叛，散播並編撰她獲得神啟，告知國王很快會被自己的子民羞辱，逐離他的國家。部分聽眾開始交耳私語，叫喊著她應該接受火焚之刑。[35]

法庭判決巴頓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禮拜日）的早晨於倫敦的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公開懺罪（public penance）。[36]懺罪當日，大教堂的臨時看臺聚集了近二千名的群眾。「海德修院院長」沙寇（John Salcot, *d.*1557）首先向群眾宣講巴頓一黨所犯下的異端罪行，[37]接著由巴頓發表懺悔聲明：

> 我，伊莉莎白．巴頓女士，坦承我是最為卑鄙、無恥之人，是所有禍患的始作俑者。利用謊言，我嚴重地欺騙了在座的各位以及更多的人。這麼做，我大大地冒犯了全能

---

[33] 關於1533-1534年此宗教改革關鍵時刻朝中氛圍以及亨利八世政策的轉變，參見李若庸，〈忠君或虔信？〉，頁55-56。

[34] 此為亨利政府的官方用法，指稱與巴頓一同被逮捕的人士。

[35]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6, no.1445.

[36] 嚴格地說，是在聖保羅大教堂院落的「聖保羅十字」（St. Paul's Cross）下。這個位於教堂外院的地點是許多重要演說的發表場所。

[37] Whatmore, "The Sermon against the Holy Maid of Kent and Her Adherents".

的上帝以及我最高貴的君主，國王陛下。

因此，我卑微且滿懷歉意地，請求你們為我的卑劣罪行向全能的上帝祈禱，並且幫助我，替我向我最高貴的君王，懇請他的仁慈與宥恕。[38]

巴頓等人的公開懺罪具有高度的宣傳意義；亨利八世希望透過這樣的公開宣講，澄清流言，消弭政治預言所帶來的傷害。[39]

巴頓在懺罪後又被拘禁了數月，亨利一直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顯然，他還沒有決定要如何處置。最後，結論在隔年（一五三四年）的三月二十一日出爐：亨利八世透過國會決議向全國民眾公告，他將懲處巴頓，以便「犯罪者謬誤且虛偽的犯行能夠廣為周知，民眾能引以為鑑。」[40]事件發展至此，「巴頓一黨」的命運大致決定。四月二十日，他們被載到「臺棚」（Tyburn）。[41]在跟圍觀群眾發表簡短的遺言後，隨即行刑。巴頓先被處以絞刑（hanged），待斷氣後，再施以斬首（beheaded）之刑。與她同時受刑的還有五位「同謀」，分別是柏金、德林（John Dering）、高德（Henry Gold）、李奇（Hugh Rich），以及李斯比（Richard Risby）。其中的柏金便是當初見證巴頓「神蹟」，引領他進入修女院的神職人員。加萊守官（Deputy of Calais）萊爾大人（Lord Lisle）的僕人胡塞（John Husee）在寫給主人的報告信中記錄了行

---

38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7, no. 72(2).

39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6, no. 1460. 依據喬比向查理五世的報告：有謠言指出，亨利本有意安排巴頓一行在接下來的星期日，走遍英格蘭的各個城鎮，做相同的懺罪聲明，「抹去她在一般人心目中的神聖形象」。不過巡迴的懺罪遊行並沒有舉行，但十二月七日的禮拜日，克蘭默帶著他們前往坎特伯里，在那裡重新舉行了一次公開懺罪。Jansen, *Dangerous Talk and Strange Behavior*, p. 55.

40 25 Henry VIII c.12.「懺罪」是基督教會的悔過方式，教徒透過「公開懺罪」取得教會（上帝）的原宥。從宗教的角度，巴頓等人經過「懺罪」已經獲得赦免。但對亨利八世來說，巴頓一黨還犯下了「意圖鼓動民眾起叛」的非宗教罪行，是以最後再以「叛國罪」論處，懲以極刑。

41 「臺棚」，今稱「史密斯地」（Smithfield），位在倫敦的舊城牆（City Wall）外，是傳統的肉品批發市場，也是處決異端與政治異議人士的地點，蘇格蘭對抗英王愛德華一世的「民族英雄」William Wallace（*d.*1305）便是在這裡處決。

刑的場景：[42]

> 今天，肯特郡的修女與兩位「守規派修士」（Observant friars）、兩名僧侶，以及一位入世教士（secular priest），從（倫敦）塔獄被提領至「臺棚」，在那裡絞死並斬首。如果這是上帝之所意願，請賜福給他們的靈魂。也就是在這天，本城〔指倫敦城〕的居民都向國王及王后陛下為他產下，以及日後生育的合法子嗣，宣誓效忠。[43]

巴頓被斬首後，她的首級被掛在倫敦橋上，而同謀者的頭顱被展示在各個城門。亨利八世這樣做的警示意味濃厚：他要倫敦乃至全英格蘭的人民知道，反對國王的下場就是如此！

巴頓修女短暫的一生就此落幕。她的下場並不令人意外；巴頓的預言冒犯了國王，觸碰了當時最為敏感的政治議題，不可能為當權者所容忍。然而，值得探討的是，「巴頓風暴」並未就此打住，它只是個開端。亨利八世在處決巴頓之後展開了一連串的政治清算：所有與巴頓來往過的人士，不管是朝中大臣、貴族名媛，抑或教會高層，都接到傳喚。在審訊的壓力下，他們被迫與巴頓劃清界線，表態效忠。巴頓案可說是亨利八世「官方宗教改革」「鎮服」政策的發軔，而巴頓案的牽連線索也揭示表面單純的「聖女預言」，在冰山的一角下連結著龐大且複雜的人際網絡。「巴頓預言」的影響力並不只在幾名一起被懲處的「同謀」，而「巴頓案」也證實，在亨利八世的改革過程中，英格蘭國內確曾蘊釀過龐大的反對聲音。

三、「巴頓案」背後的人際網絡

克蘭默在「巴頓案」事後的調查報告中寫道：與巴頓修女互動的人士非常廣泛，他們跨越了性別、地域，與階級，從教會人

---

[42] John Husee 是 Arthur Plantagenet, Lord Lisle 的僕人。Lisle 長期待在歐陸的 Calais。Lisle Letters 是記錄亨利朝事蹟重要的史料。

[43] 王后陛下指的是安．葆琳。葆琳在一五三三年九月產下伊莉莎白公主。*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7, no. 522.

士、政治菁英，貴族名媛，到教廷代表都有。[44]事實上，巴頓曾會面的對象還包括了教廷使節。一五三三年四月，教廷使節達里歐（Silvestro Dario）在前往多佛（Dover），準備返回歐陸的途中，接到巴頓與他面談的要求（巴頓後來宣稱，她曾就使節的來訪看見過異象）。達里歐接見了巴頓，而巴頓要他嚴正地轉告教皇：「透過他〔指達里歐〕，她傳遞上帝的訊息給教皇：他應當被上帝嚴懲，倘使他未能譴責國王的離婚與再婚。」[45]同樣的訊息，巴頓也透過另一名教廷大使普雷歐（Antonio de Pulleo）重申。[46]依據克蘭默的記載：「她寫信給教皇，以上帝之名，要求他阻止該樁婚事，運用他擁有的崇高且神聖力量。如此，他才能躲過上帝的重擊，上帝早已垂掛在他頭頂上的重擊，如果他抗命而行的話。」[47]巴頓支持凱撒琳，反對亨利再婚，這是眾所周知的立場。但她預言者的身份不僅讓她直斥英格蘭的政治領袖亨利八世，連「基督教世界的大家長」羅馬教皇也被她厲言訓示，確實令人驚訝。[48]教廷使節的接見顯示巴頓的聲名遠播，不過她最重要的影響力仍然在英格蘭境內。

對於「巴頓案」背後牽涉的人際網絡，我們可從幾條史料中得到線索。首先是一五三三年第一波的逮捕名單。依據都鐸編年史家霍爾（Edward Hall, 1498-1547）的記載，這次遭到逮捕的共有十人：

> 大約在本季進入尾聲之時，一位新出現的聖徒與聖潔的偽善者，叫做「肯特郡的少女」（the maid of Kent），經由坎特伯里大主教、克倫威爾大人（Lord Cromwell），以及一

---

44 見前引文。Jenkins, *The Remains of Thomas Cranmer*, vol. 1, p. 80.

45 Wright, *Three Chapters of Letters*, p. 16.

46 Wright, *Three Chapters of Letters*, p. 16.

47 Jenkyns, *The Remains of Thomas Cranmer*, vol. 1, p. 80.

48 由於史料的限制，我們已無法得知教廷後續如何處理巴頓的示警。不過，可以說，有了「先知傳統」背書的巴頓，在某個意義上透過神啟預言已成為（自許為）上帝的直接發言人。而「預言者」在傳統天主教會中的地位也展現在達里歐與普雷歐兩人的對待態度上：他們願意接待並聽憑巴頓發表如此強烈的言論，顯示「聖女預言」的份量。

> 位名為修・拉蒂默（Hugh Latimer）的教士……的戮力、劬勞，以及辛苦，讓這位女士的欺騙與狡詐被揭發出來，公諸於世。經過數次的審訊，她與她的追隨者在十一月時被帶到星室法庭。他們的名字如下：第一位，伊莉莎白・巴頓，自稱為「肯特郡的聖女」；理查・麥斯特，肯特郡「阿靈頓」的堂區神父；愛德華・柏金，神學家，坎特伯里的僧侶；約翰・德林，同樣是坎特伯里的僧侶；愛德華・德威茲，鄉紳；湯瑪斯・勞倫斯（Thomas Lawrence），坎特伯里副主教的書記；亨利・高德（Henry Gold），「阿德瑪麗」（Aldermary）的堂區神父，神學學士；修・李奇，守規派修士，以及理查・李斯比、湯瑪斯・高德（Thomas Gold），鄉紳。[49]

在第一波的逮捕名單中，除了德威茲之外，[50]其他都是巴頓的忠實信徒，他們的大力奔走使得巴頓的聲名大噪。仔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忠實信徒間存在著一個關鍵的連結，那就是「肯特郡／坎特伯里」這個特定的地緣。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巴頓修女是先在肯特地方形成一個核心集團（inner circle），然後再透過核心成員的影響力將預言傳播出去。[51]

一五三四年「巴頓案」的判決提供了我們進一步驗證的線索。[52]在判決文中，除了巴頓之外，還有六人被判處極刑，他們分別是麥斯特、柏金、德林、（亨利・）高德、李奇，以及李斯比。[53]

---

[49] Edward Hall, *Hall's Chronicle; 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 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 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 in Which are Particularly Described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ose Periods* (1548; London, 1809), pp. 806-807.

[50] 德威茲是因為出版了關於巴頓的「神蹟」而被捕。他在繳交罰金後被釋放，由此可知他並不是真正的核心成員。

[51] 對於巴頓預言的傳播網絡，Shagon 的文章有初步的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與本文做比較。見 Shagon, "Print, Orality and Communications in the Maid of Kent Affair", pp. 29-33. 類似的論點亦出現在其專書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pp. 77-80.

[52] 25 Henry VIII, c.12.

[53] 麥斯特最後並沒有真的被處決。

亨利政府調查後認定這六人就是巴頓修女的主要共謀。

麥斯特等人是如何進入巴頓的圈子呢？地緣與人脈連結是兩大關鍵。麥斯特是巴頓居住的阿靈頓的堂區神父，也是最早通報、記錄巴頓預言的人。柏金是被坎特伯里大主教指派去驗證巴頓神啟的調查員。德林與柏金同為「基督堂」的僧侶。[54]可以說，最初被指派去檢驗巴頓預言的人，最後成了她的忠實支持者。

麥斯特三人與巴頓結識的過程很清楚，那麼其它三人又是如何進入巴頓的核心圈呢？「坎特伯里」（或者更精確地說，「坎特伯里大主教的家宅」）是其中的關鍵。高德的身份是倫敦「阿德瑪麗」堂區的神父，但在調任之前，他本是坎特伯里大主教韋漢的祕書。高德畢業於劍橋大學，求學時曾師事知名的「雷諾斯神父」（Richard Reynolds, c.1492-1535）。[55]高德的表現優異，曾在一五一六年獲選為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的創院成員（foundation fellow）。他在一五二二年被指派擔任大學的宣道人（preachers），可能因此引起韋漢的注意，最後召入家宅成為祕書。[56]高德如何結識巴頓我們已無法確知，但處在大主教的家宅，高德輕易便能接觸到巴頓的事蹟。以他對信仰的虔信，受巴頓修女吸引成為追隨者，是相當合理的結果。

相同的情形也可能發生在另外兩名核心成員—李奇與李斯比—的身上。李奇與李斯比都是方濟會守規派的修士。方濟會於一二二四年首次傳入英格蘭，他們最初在坎特伯里落腳，然後逐

---

54 德林畢業於牛津大學的 Canterbury 學院。德林家族為肯特郡的望族，世代都有一位成員獻身教會。德林的叔父 Edward Dering 曾是基督堂的食物管理員（cellarer，跟 Bocking 一樣），是修院中的重要管理階層。德林在1519-1520年間追隨其叔父的腳步進入基督堂成為本篤會的修士。

55 雷諾斯神父是知名的學者與修士。他因為反對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最後慷慨殉道。

56 Neame, *The Holy Maid of Kent*, p. 162. 高德在宗教上相當嚴格，他主要的工作之一是代表大主教宣講。高德的講道辭多少讓我們感受到他激烈的性格：他曾大力宣揚聖像與聖徒崇拜的意義，並且將大主教譬喻為帶領以色列人逃離埃及的摩西，痛斥坐在臺下的聽眾滿身罪惡。而最具指標意義的事件是他曾因什一稅的繳納以及教民踰矩的娛樂行為等問題，與教民發生糾紛，最後鬧上星室法庭。Neame, *The Holy Maid of Kent*, pp. 165-166.

漸往倫敦、牛津等地建立修院。方濟會士以安貧（模仿基督的清貧生活）為宗旨，不能擁有財產（教產由所在城鎮托管），以托缽維生。方濟會士安貧的形象獲得很高的敬仰，在英格蘭快速發展。一二四二年時，全英格蘭已至少成立了四十九間會所。然而，隨著修會的擴張，歐陸的方濟修會逐漸出現財富累積等違背建立初衷的現象。是以，部分會士另立「守規派」，以恢復安貧教規為宗旨。可以說，和允許擁有不動產及一定收入的溫和派（Conventuals）相較，「守規派」在教規上更為嚴格，在宗教立場上也更為堅持。守規派在一四八二年首度傳入英格蘭，到一五一七年全英格蘭共有六間會所，分別在坎特伯里、格林威治（Greenwich）、南安普敦（Southampton）、里奇蒙（Richmond）、新堡（Newcastle）以及紐沃克（Newark）。其中，坎特伯里、格林威治、里奇蒙三間修院位在坎特伯里與倫敦地區，與修女有地緣關係。[57]

「守規派」的聲名遠播，連亨利八世本人都曾多次向教皇盛讚他們是「基督徒安貧、真誠、慈善的理想典範」。[58] 李奇與李斯比就分別是坎特伯里與里奇蒙兩處修院的院長（guardians）。他們與巴頓所在的肯特郡有地緣上的接近。而該教派的嚴格教規，也可以解釋他們對（撥亂反正）「聖」修女的信仰與支持。

從麥斯特到李斯比的背景分析顯示，「地緣」是一個「巴頓核心集團」組成的重要元素：所有成員都與巴頓所在的坎特伯里，以及鄰近的倫敦地區有關。可以說，巴頓的核心成員是以「坎特伯里－倫敦」為中心建立起來的。

我們還可以稍微觀察集團成員間建立聯繫的方式。一五三二年，高德寫了封信給素昧平生的德林，這是很好的例子：

---

[57] 格林威治修院因為就在王宮旁，所以與王室一向關係密切。

[58] Henry Ellis, *Original Letter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History*, 3rd ser. (London: Dawsons, 1969), vol. 1, p. 165.「守規派」修院後來因為反對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而遭到強硬的打壓。

親愛的德林先生：

我向你問候，像不曾謀面但透過我心靈上的姊妹—伊莉莎白．巴頓女士—的虔誠訊息在心靈上已然熟稔的兄弟般地親愛。基於上述理由，我無法不以熾熱的心愛著你，因為我從經驗知曉……她只會熱誠地接受被上帝所愛且認可的人成為她的知交……因著她對於你以及你對待她的溫柔之心，上帝知道，我只能比對待我其它世間友人（我從他們那裡至今蒙受許多世俗的恩惠）更加熱烈地愛你，渴望同樣獲得你特有的愛，希望你終身為我日日祈福，就像我，依上帝所願，為你所做的一般。

在過去的七天，我與上述（也是你的）姊妹在一起，[59]在這期間，她收到你的來信。她當時身體健康，感謝全能的主。我打算這幾天就到她身邊待三星期至一個月，依上帝所願，我答應你，親愛的德林先生。

……請代我向你的屬靈導師李斯比神父、修女院長女士，以及其它人問好。

我寄上一小片花園裡的無花果以及一些葡萄乾給你。你如能親手寫一二句話給我，將會是最好的信物。我的僕人將依你所願停留（以等候你的回信）。別讓他看到我信裡的內容。[60]

高德的信件傳遞了幾項有用的訊息：他的用字遣詞強烈地展現他的宗教激情以及對巴頓的崇拜。透過巴頓的影響，他主動且熱情地聯繫同為巴頓支持者的德林。高德在信中提到李斯比是德林的「屬靈導師」，這或者說明了李斯比進入巴頓圈子的機緣。最後值得注意的是，高德在信末特別叮囑「別讓他（送信的僕人）看到我信裡的內容」。由此可知，早在一五三二年高德（又或者說是巴頓身邊的人士）便意識到相關事務的敏感性，刻意將聯絡細節保

[59] 指巴頓。

[60] Neame, *The Holy Maid of Kent*, pp. 166-167.

密。

至此，巴頓核心集團的組成已大致清楚。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是巴頓預言如何傳布出去？「亨利八世即將失去王位」這則巴頓最重要的預言是一條很好的線索。這項預言因為深具威脅，是以核心成員被分別審訊；他們的供詞提供我們重建這個傳播網絡重要的訊息。首先，巴頓將預言告訴了幾個核心人物。

> 修女坦承她將與國王統治相關的神啟，也就是他將在迎娶王后陛下後的一個月內失去王位，告訴了柏金博士，她的屬靈導師、羅徹斯特主教以及他的教堂神父阿德森博士（Dr. Addison）、亨利・高德先生、德威茲先生、「阿靈頓堂區神父」理查・麥斯特、李奇神父、李斯比神父，和勞倫斯神父。[61]

接下來，這些人又分別透過自己的人脈網絡將消息傳遞出去。依據一五三三年的審訊記錄，我們得到這樣的名單：

> 李斯比神父將相關的神啟透露給愛塞特侯爵夫人（lady Marques of Exeter）、羅徹斯特主教、摩爾先生、德爾菲先生（Mr. Delphe）、一名在漢普敦的守規派入世修士；里奇蒙的李奇神父；路易・威金森神父（Father Lewes Wilkinson）、羅伯・盧弗修士（Friar Robert Rufford）、約翰・凱比爾（Friar John Kebill），以及坎特伯里的湯瑪斯・若取（Thomas Roche of Canterbury）；卡爾特派辛尼修院的威廉・何（William Howe of the Charterhouse of Sheen）。
>
> 約翰・德林，僧侶，將關於國王統治的神啟透露給克李斯平先生（Mr. Crispin），愛塞特侯爵夫人的教堂神父。
>
> 理查・麥斯特先生……透露給奧立弗・威金森（Oliver Wilkinson），他在阿靈頓的教士；威廉爵士、街埕聖母堂

[61]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6, no.1468.

的教士；約翰・克拉克（John Clark）……。

柏金博士……透露給高德先生……李斯比修士……德威茲先生。羅徹斯特主教可能看過記錄修女神啟的書，如果柏金博士帶給他的話。他已經將神啟……透露給里茲（Leeds）與豪頓（Horton）的修院院長……坎特伯里聖保羅教堂的教士、坎特伯里基督堂……的巴尼斯先生（Master Barnes）……尼爾先生……羅伯・杭特 （Robert Hunt）；湯瑪斯・威爾夫（Thomas Wilford）、湯瑪斯・韋漢（Thomas Warham）、湯瑪斯・貝克特（Thomas Becket）。修女告訴他，她將與國王有關的神啟告訴了羅徹斯特主教。

亨利・高德……透露給倫敦的法官先生、尼爾先生、湯瑪斯・懷特、羅伯・道布尼、湯瑪斯・珀西；湯瑪斯・高德跟他的妻子；坎特伯里的勞倫斯先生；李奇、李斯比神父，以及守規修士勞倫斯；辛尼修院的麥可神父（Father Michael）、曼神父（Father Man），以及威廉・何修士；希詠修院的修女院長、告解神父、雷諾斯先生[62]與京斯敦夫人；坎特伯里基督堂的柏金博士與德林先生；吉林罕的蘭弗先生（Mr. Langford of Gelingham）；史蒂芬斯先生（Mr. Stephyns），跟愛塞特侯爵一起，以及他的其它僕人。柏金博士、高德和德林曾閱讀過摩爾先生寫給修女的信函，李奇修士曾聽聞過。修女也承認有上述的信件。[63]

在所有核心成員中，傳播網路最廣的是李奇神父。他的供詞寫道：

修・李奇，守規派修士，將國王與他的統治的神啟傳給王

[62] 即前面提到的雷諾斯神父。
[63]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6, no. 1468.

子遺孀（Princess Dowager）、瑪麗小姐（lady Mary）、[64]索爾茲伯里夫人（lady Salisbury）、胡塞大人及夫人（lord and lady Hussey）、[65]愛塞特侯爵夫人、羅徹斯特主教、德貝夫人（lady Derby）、湯瑪斯・摩爾爵士（Sir Thomas More）、亞伯先生（Mr. Abel）、國內的兩名教士，姓名不詳。倫敦商人懷特先生（Mr. White）、道布尼先生（Mr. Daubeney）、珀西先生（Mr. Percy）、尼爾先生（Mr. Nele）及妻子。倫敦的法官、[66]修・福克納（Hugh Falconer）及他的妻子、西默先生（Mr. Seymour）和他的妻子、希詠修院的告解神父、[67]京斯敦夫人（lady Kingston）與在場的其他女士。希詠修女院院長、辛尼修院院長、教士代表（proctors）、威廉修士、教堂司事、堂區神父、里奇蒙女修道院（convent of Richmond）的修士、一些姓名不詳的各教團修士。[68]亨利・高德，教士、湯瑪斯・高德和他的妻子。一名來自溫莎（Windsor）的教士、兩位聖・阿爾班修院（St. Albans）的教士，姓名不詳。柏南修女院長（abbess of Burnham）。德林先生，僧侶。貝林翰夫人（lady Belingham）、湯瑪斯・愛倫德爵士（Sir Thomas Arundel）、約翰・愛倫德（John Arundel）、約翰・凱路爵士（Sir John Carew）及他的兄弟。凱撒琳・相波女士（Katherine Champer）。他〔指李奇〕的兄弟的妻子，多少也告訴他的兄弟。[69]

---

[64] 這是在宗教改革後亨利官方給予原王后凱撒琳的稱呼，亦即，將她定位為已故王子亞瑟（Prince Arthur）的遺孀。由於審訊筆錄為官方文獻，是以採取此官方立場。同樣的，原來的瑪麗公主（Princess Mary）也被摘去公主頭銜，成為一般仕女。

[65] John Hussey.

[66] John Baker.

[67] John Fewterer.

[68] 依 Neame 的說法，這些人為 Knights of St. John of Jerusalem，即醫院武士會的成員。

[69] 在這些人士中，Neame 確認出36人的姓名。Neame, *The Holy Maid of Kent*, pp. 181-184.

李奇這份長長的名單，除去無法確知人數的「在場的其他女士」、「姓名不詳的各教團修士」等對象，可以確定的聽眾就有四十六人，其傳布之廣令人印象深刻。尤其，這只是第一層的傳播網絡，這些聽眾還會再將相關消息往外傳遞，加乘之後，獲知訊息的人更多。

李奇的這份名單也同時呈現巴頓預言傳播網絡的組成。李奇傳播的對象大致分為三類：首先是以亨利八世的元配王后凱撒琳為核心的宮內人士，裡面包括了王后、瑪麗公主、索爾茲伯里夫人、胡塞夫婦，以及愛塞特侯爵夫人。凱撒琳與瑪麗是母女，索爾茲伯里夫人是凱撒琳的女伴，[70]胡塞是瑪麗的內侍官（chamberlain），愛塞特夫人是凱撒琳內侍官的女兒，而亞伯是凱撒琳的御用神父，這些人士的關係緊密。[71]除了凱撒琳身邊的人士之外，也有一些朝中大臣以及女眷與聞訊息，這包括了知名的「羅徹斯特主教」費雪、摩爾爵士，以及保守派領袖諾弗克公爵（Duke of Norfolk）的女兒德貝夫人。

李奇的另一類聽眾是宗教人士。除了與巴頓關係密切的高德、德林，以及偶然造訪的教團與修士之外，李奇接觸的名單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位於埃爾沃斯（Isleworth）的希詠修院與倫敦的辛尼修院。這兩個修院不僅與李奇接觸的人數最多，層級最高，它們也是日後反抗亨利八世新教政策最著名的修院。他們在反抗亨利八世的過程中遭到嚴厲整肅，在反對「官方宗教改革」的異議團體中極具代表性。[72]在宗教人士之後，最後一類的傳播對象是地方人士，像是倫敦的商人、法官、以及地方的郡長（sheriff）等。[73]

---

[70] 索爾茲伯里夫人 Margaret Pole（1473-1541）為亨利朝反對宗教改革的知名人士 Reginald Pole（1500-1558）的母親。Margaret 後來受到兒子牽連而被亨利八世處決。參見李若庸，〈忠君或虔信？〉，頁66-76。

[71] 他們可能在同一場合聽聞到巴頓的預言。但，能被允許同場聆聽敏感的預言，顯示與聞者獲得相當的信任。

[72] 關於亨利八世對修院的鎮壓，本人將另文討論。

[73] Sir Thomas Arundel 與 Sir John Arundel 分別是英格蘭西南 Dorset 與 Cornwall 的郡長。

克倫威爾在一五三三年寫給亨利八世的報告中，生動地呈現這三群人間的互動：

> 收到勞倫斯修士的密報，從他返回倫敦後，有好幾件事跟肯特郡的聖女有關，他將只對國王報告，不向他人透露。另外，兩名外地的守規派修士最近來到國內搜尋所有相關的書籍與意見等，打算交給佩脫修士（friar Peto）。[74]建議採取行動逮捕這些托缽修士，他們現在正跟王子遺孀在一起，他們由一名富有的倫敦商人提供經費。[75]

克倫威爾的這段話提供了兩項訊息。首先，亨利八世有自己的「情報網」：國王在民間安插了自己的「探子」，如勞倫斯這樣的修士就是其中的成員。他以修士的身份在國內各處走動，打探消息。[76]而值得注意的是，機密消息只向國王一人報告，連克倫威爾也不得與聞。這樣的「情報網」運作顯示亨利八世相當在意民間的反應，而且他處事謹慎，聽取報告不假手他人。[77]另一個重要的訊息是，在各地托缽傳教的修士是巴頓預言與相關人士重要的聯繫及傳播管道。透過他們的「行走」，原本侷促一隅的消息被傳播開來，而他們連結的人際網絡從倫敦商賈到宮廷內眷，不一而足。可以說，宗教人士是最重要的訊息串聯者。

最後要補充一提的是，除了透過人際網絡以口語傳遞的方式傳播巴頓預言外，巴頓的支持者還利用另一個令亨利八世深為警戒的傳播媒介來散佈預言，那就是書籍出版。前面提過的克倫威

---

[74] William Peto 亦為守規派修士。他是凱撒琳王后的懺悔神父，支持王后，反對離婚案。見 T.F. Mayer, "Peto, William (*c.*1485-1558)",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icle/22043, accessed 7 Aug 2012]。

[75]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6, no. 1369.

[76] 格林威治修院的（John）Lawrence 修士是克倫威爾安插在修院中的探子，與另一位（Thomas）Lawrence，坎特伯里副主教的書記是不同的人。Lawrence 在巴頓案後曾寫信給克倫威爾，希望讓他取代李奇或李斯比擔任院長。參見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7, no. 139.

[77] 我們難得從這樣的例子一窺亨利八世與克倫威爾間的互動。國王在真正關鍵的事務上是不假手大臣的，即使是當時極受倚重的克倫威爾也不例外。

爾報告信是很好的線索：「兩名外地的守規派修士最近來到國內搜尋所有相關的書籍與意見。」[78]事實上，巴頓預言出現之初，同鄉的士紳德威茲便將她的事蹟編撰成二十四頁的小冊子，記述她的生平、罹病、以及最早神啟。[79]在德威茲的小冊子之外，柏金也將修女的預言撰寫成書。資料顯示克倫威爾在一五三三年九月正追查一本他稱為「修女之書」（the Nun's book）的出版品。這本書是由柏金編纂，交由倫敦的印刷商史考特（John Scott）出版。依據史考特的供辭，當他被克倫威爾逮捕時，手邊還有兩百冊「修女之書」，而其餘的五百冊他已經交給了柏金。[80]而巴頓集團的判決令上也寫道：柏金寫了一本「有關伊莉莎白．巴頓預言的大書」。[81]

除了柏金之外，德林也寫了一本有關修女神啟的書。一五三四年克蘭默寫給克倫威爾的信中提到：「我最近獲知，德林修士最近編輯且撰寫了一本專著，《關於雙重的靈魂》（*de Duplice Spiritu*）。」經過克蘭默「勤奮的（diligent）的審訊」，[82]德林承認有這樣的一本書，但他不知道現在流傳到那裡，書的原稿也已經銷毀。克蘭默要求德林憑記憶來重述此書。另外，他也聽說德林給了高德一本，此書「仍在他手中」，建議克倫威爾馬上採取搜索行動。[83]

除了柏金和德林的兩本書，判決令也指出，還有多本相關書籍存在：修女和她的支持者撰寫了各種書，大大小小都有，有手抄本也有印刷出版。[84]顯然亨利政府儘管全力查禁，但巴頓的相關著作已經廣泛流傳。舉例來說，早在一五三〇年，遠在英吉利海

---

78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6, no. 1369.

79 見本文第一節。

80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6, no. 1194.

81 25 Henry VIII c. 12.

82 此為克蘭默自己的用詞，藉以顯示自己的努力。克蘭默雖為坎特伯里大主教，但克倫威爾才是亨利八世座前的第一人，是以連克蘭默都需要向克倫威爾邀功。

83 Jenkyns, *The Remains of Thomas Cranmer*, vol. 1, pp. 88-89. 坎特伯里的勞倫斯修士負責文稿的抄寫。

84 25 Henry VIII c.12.

峽彼岸的新教改革家庭戴爾（William Tyndale, c.1494-1536）就曾經抨擊巴頓預言。他在稍後的一五三一年發表與摩爾神學辯論的專著《回應湯瑪斯．摩爾爵士的對話》（*An Answer Unto Sir Thomas More's Dialogue*）書中，[85]更批評巴頓預言者的身份。庭戴爾嘲笑地說，這位「神的女詩人」的預言，「一點押韻與邏輯也沒有」。[86]庭戴爾雖然對於巴頓不假辭色，但也顯示他讀過巴頓的相關書籍。確實，如詹森（Sharon L. Jansen, 1951-）所言，一旦印刷的書籍開始流通，任何接觸到的人士都可能透過抄寫的方式讓著作進一步地傳播。[87]文字傳播能超越口語傳達的限制，在速度與數量上更具效果。這也讓亨利八世政府難以完全掌控與封鎖訊息。

四、「巴頓案」的處置

伊莉莎白．巴頓修女的預言透過核心成員的努力，藉由抄寫、出版，以及口語傳播等途徑，穿越了性別、地域，以及階級的藩籬，層層地傳遞出去，這一波波預言所激起的影響與感染力，讓未獲男嗣的亨利八世感到威脅。巴頓集團的下場便是面臨國王無情且嚴酷的懲處。一五三三年十一月八日，亨利八世召開星室法庭，最後判定巴頓與她的核心成員犯了最嚴重的「叛國罪」（high treason），需要接受極刑。[88]

一五八二年，一位名為布契爾（Thomas Bouchier, *d.1586*?）的方濟會神父，將李奇與李斯比兩人被處決的事蹟撰寫成《殉道

---

[85] 此書是回應摩爾一五二九年的著作《關於異端的對話》（*The Dialogue Concerning Heresies*）。《關於異端的對話》是以「對話體」（dialogue）寫成，透過摩爾與一位受路德、庭戴爾等新教改革者影響的學子（student）間的辯論，闡述他的宗教理念。

[86] E.J. Devereux, "Elizabeth Barton and Tudor Censorship,"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vol.49 (Autumn 1966), p. 99.

[87] Jansen, *Dangerous Talk and Strange Behavior*, pp. 51-52.

[88] 判決書陳述行刑的程序：「從〔倫敦〕塔獄拖曳穿過倫敦城，到達處決地點『臺棚』。在那裡，由頸項吊懸軀體；在斷氣之前，斬斷繩子，拋擲地上；將五臟六腑掏在面前，一息尚存；再將頭顱擊落，軀體卸成四塊；然後，將頭顱與屍塊懸掛在國王指定的地點。」Neame, *The Holy Maid of Kent*, p. 321。

修士的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de Martyris Fratrum*）一書，在巴黎出版。布契爾寫道：

> 在一五三七年，許多宗教人士被國王下令逮捕，其中有兩位傑出的人士，值得教會給予最高的敬意，並無愧他們修院院長的身份。他們一位是李斯比神父，坎特伯里的院長，另一位是李奇神父，里奇蒙的院長……他們承受了極大的苦難，身上負著鏈條，雙足銬著腳鐐，這樣日夜地躺臥在地上……沒過多久，兩位可敬的神父被從牢獄帶出來接受極刑……他們被放上拖車……拖車沒有輪子，拖曳在地上，增加了他們許多的痛苦……到了行刑地點，他們看到一座高聳的絞刑臺，旁邊的大鍋裝滿了滾水，下面的火熊熊地燃著。他們被要求審視各項執行死刑的工具，一方面增加他們的痛苦，一方面打擊他們虔信的決心。

布契爾描述李斯比被處決的情形：

> 在短暫的停頓之後，坎特伯里的院長（李斯比神父）被推上梯架。當他站在架上時，一名使者帶著國王的口信疾馳而來：如果他們願意揚棄教皇，他們將能重獲自由與生命……神父們堅持他們的決心，並且說，他們唯一要傳達給教皇的訊息是，為了神聖的教會，他們很樂意承受最為駭人的死亡方式。
>
> 劊子手接著走近坎特伯里的院長，後者不斷地重覆唸著：我很樂意為祢作出犧牲，彰顯祢的名號，因為這是美好的！（*voluntarie sacrificabo tibi et confitebor nomini tuo, quoniam bonum est*）李斯比神父的繩索被敏捷地砍斷，他被猛然地甩下梯架，活活地摔在地上。
>
> 為了折磨得更徹底，劊子手快步上前割下他的生殖器；接著，剖開他的肚子，把心扯出，高高舉起，供群眾審視；這顆心還在顫動著。他然後將之拋進火堆，跟其他的腸子

一起。

接著，李斯比神父的頭顱被斧頭砍下，他的身軀被卸成四塊，通通扔進大鍋。不一會兒，它們又被取出來，懸掛在倫敦城的各城門；而他的頭，依據英格蘭處決叛國罪犯的慣例，被高掛在倫敦橋的柱子上。

跟李斯比神父一樣，另外一位同時行刑的李奇神父也遭遇相同的過程，他甚至出言嘲諷他的劊子手：

李斯比神父一死，里奇蒙的院長神父爬上了梯架。幾乎人人希望他活下來，他們努力地勸說他改變心意，避開令人畏懼的結局。沒有任何事可動搖他，他拒絕他們的說理，把那些當成戲謔。

當官員們理解此點，他們無比憤怒。李奇神父馬上被從梯架上扔下……就像李斯比神父一樣。

劊子手劃開他的肚子以挖出他的心。當這個壞蛋（the wretch）〔劊子手〕的手伸近，神父說道：「你手上握的是給上帝的獻祭。」接著，這顆心被從他的身體裡粗暴地扯出，丟進火裡。他的頭被用斧頭砍下，他的軀體一分為四，然後扔進大鍋，煮成半熟以消除氣味，因為稍後要掛在立於城門的竿上供市民觀看。[89]

布契爾的描述生動但不可盡信，因為內容有明顯的錯誤。舉例來說，巴頓案的行刑年份是一五三四年，不是布契爾所說的一五三七年。又譬如，李奇是否在此次行刑中被處決也有爭議，就有研究認為李奇在行刑之前已死在獄中。[90]由此可知，布契爾的描述不

[89] Neame, *The Holy Maid of Kent*, pp. 337-338.

[90] Richard Rex 認為李奇是死在牢中，並非處決身亡。亦即，真正在四月二十日被處決的只有巴頓與其餘四人。Richard Rex, “The Execution of the Holy Maid of Kent,”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64 (1991), pp. 216-20. 同樣的論點亦見 Cheney, “The Holy Maid of Kent,” p. 114.

乏虛構的成份，恐有自己的想當然爾。而他將行刑的劊子手稱為「壞蛋」，顯然有特定的立場。不過，即使如此，布契爾的描述大致符合判決令的行刑流程，仍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91]

除了嚴懲巴頓集團的核心成員外，亨利政府也針對出版品作出處置：持有相關出版品的人士，不管那一種版本，都必須在四十天內上繳，否則處以罰鍰或監禁。[92]而核心集團以外的人士，只要跟巴頓有過聯絡，都被傳訊調查：

> 上述的約翰，羅徹斯特主教、湯瑪斯．高德、湯瑪斯．勞倫斯、愛德華．德威茲、約翰．阿德森，和湯瑪斯．亞伯，因犯下傳聞中的過錯，將依國王的指示關押監禁，所有的物品、家產以及債權…在一月十六日以及從該日開始，由國王陛下沒收；上述的約翰．阿德森以及湯瑪斯．亞伯，他們在這個一月十六日以前擁有的聖俸與升遷，將從三月二十日起……經由本令失效，猶如約翰．阿德森與湯瑪斯．亞伯已然死亡。[93]

對此，喬比寫信跟查理五世報告：亨利八世相信仍有共犯在逃，要求繼續追查與巴頓相關的人士。

> 主要的工作仍在持續，（喬比繼續寫道），因為國王堅稱，不論代價，上述修女的同謀應被視為異端，因為他們相信她的預言，並且，不揭發修女關於他〔指亨利國王〕的預言就是犯了叛國之罪。他因此下令，她的同謀，一旦發現，將被逮捕並且充公財物。[94]

---

91 從布契爾的寫作動機我們可以理解其呈現出來的內容。他是在一五五七年信仰天主教的瑪麗一世統治時期加入天主教的方濟會。此書在一五八二年出版，當時英格蘭已改由主張國教會的伊莉莎白女王當政，天主教徒在英格蘭的處境日益艱困。布契爾的書最後選擇在巴黎發行，自然是囿於情勢，有為天主教會宣傳的意味。

92 Neame, *The Holy Maid of Kent*, p. 325.

93 Neame, *The Holy Maid of Kent*, p. 320.

94 Martin A.S. Hume and others (eds.), *Calendar of Letters, Despatches and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 (London, 1862-1954), vol. 4:2,

五、「巴頓案」的後續調查

正如喬比的報告所揭示，「巴頓案」並沒有因核心人士的處決而落幕。最後證明，處決不是一個終點，而是開端，一個思想整頓與忠誠測試的開始。凡是與巴頓牽扯上關係的人，無論層級多高，包括凱撒琳王后本人，都難逃被傳訊甚至懲處的命運。早在一五三三年十一月，喬比就寫信向查理五世報告，凱撒琳王后受到調查。喬比寫道：最近有名修女被捕，

> 許多人都被懷疑曾鼓勵她發表煽動民眾叛變的預言。王后〔指凱撒琳〕猶如接獲過上帝的指示，在任何時刻都謹言慎行，避開所有的麻煩與嫌疑。因為修女曾多次堅持，要求與她談話，撫慰她的磨難，但王后從不願見她。然而，御前會議並不就此停止對王后的持續調查，探詢王后是否曾與她〔指巴頓〕有過任何接觸。她不為自己感到害怕，她一向如此，但她為愛塞特侯爵與侯爵夫人以及虔誠的羅徹斯特主教感到擔憂，因為他們與她相當熟稔。[95]

喬比的書信透露了一五三三年年底英格蘭朝中的氛圍：巴頓被捕，亨利政府持續追查與她相關的支持者，王后凱撒琳也在被調查之列。凱撒琳相當機警，雖然身邊多名人士（如亞伯、李奇等人）都曾與巴頓接觸，但她始終拒絕與修女碰面。然而，「愛塞特侯爵」夫婦以及「羅徹斯特主教」已經陷入危機。[96]

喬比的報導顯示巴頓案開啟了亨利朝一波的政治偵防，它標幟著亨利八世政策的改變：國王逐漸從一五三〇年代初期的溫和勸服，轉變成為恩威並施，甚至是威脅利誘的處理模式。他接著在一五三四年通過「繼承法」與「叛國法」，要求全國人民（至少

---

no. 1153.（以下稱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Spanish*）

95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6, no. 1419.

96 順帶一提，這封信也提供了一項值得注意的訊息，即，凱撒琳雖然不曾與巴頓「直接」接觸，但對於巴頓及其往來人士相當熟悉：她雖然不見巴頓，卻知道巴頓與費雪等人來往密切。顯然，王后身邊的人士已與巴頓建立聯繫，並且將訊息固定地傳達給她。

是重要人士）宣誓接受他與葆琳的子嗣為繼承人，承認他身為英格蘭教會領袖的地位。許多當時朝中的菁英被迫殉道、流亡或屈服。[97]

亨利八世如何以巴頓案為由進行這一波的政治整頓呢？幾位指標人物的遭遇提供了線索。一五三四年三月七日，喬比向查理五世報告，國會通過提案，將凱撒琳王后貶為「王子遺孀」，並將她所有的資產充公。[98]喬比接著說：

> 聖潔的羅徹斯特主教被傳訊，我認為他深陷殺身之險，因為他曾多次與修女交談，就是之前我寫信跟陛下您談到的那位。年邁體衰的主教被傳訊，不是讓他為自己辯護，而是讓他及時到達倫敦聆聽對他的判決。摩爾大人，英格蘭過去的大法官……在過去幾天接受克倫威爾的審訊，現任的大法官則盤問他過去寫給上述修女的信……。[99]

喬比信中提及的羅徹斯特主教費雪以及摩爾是最受關注的被傳喚人士。[100]我們接著就以摩爾為例，重現一五三三年底到一五三四年年中這波調查的情況。

摩爾是《烏托邦》（*Utopia*）一書的作者，著名的人文主義者。他在一五三四年二月獲知上議院提案，要就他與巴頓的關係作出懲處。他於是寫信向克倫威爾陳情，希望為自己辯白。[101]克倫威爾後來透過摩爾的女婿傳話，要求他詳細交待與巴頓互動的過程。摩爾於是寫了封「自白信」，說明事情的來龍去脈。這封信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線索。

摩爾在自白信的開頭首先感謝克倫威爾願意接受他的解釋，

---

97 李若庸，〈忠君或虔信？〉，頁53-88。

98 此舉是為了逼迫凱撒琳屈服，接受國會通過的新「封號」—「王子遺孀」。

99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Spanish*, vol. 5, no. 22.

100 費雪是當時知名的天主教神學家。他的安貧（他在英格蘭最貧窮的羅徹斯特教區擔任了31年的主教）與學養獲得當時普遍的敬仰。他在婚姻問題上公開支持凱撒琳，拒絕接受「國王至高權」，最後在一五三五年為亨利八世處決。關於費雪，可參見李若庸，〈忠君或虔信？〉，頁59-65。

101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7, no. 265.

接著陳述自己與巴頓往來的全貌：

> 謝謝他〔指克倫威爾〕寬容地接受他的失禮長信，並且告訴他的兒子羅珀[102]希望從摩爾那裡獲知他與坎特伯里的無知修女（lewd nun of Canterbury）間來往的情形。大約是八、九年前，他第一次聽聞這名主婦。[103]當時的坎特伯里主教……送交國王一付卷軸，裡面記錄著她在靈魂出竅時說過的話。國王將卷軸交給摩爾，詢問他的看法。告訴他〔指國王〕，卷軸中沒有任何值得他注意或重視的，因為，除了部分內容押有韻腳外，內容滿是粗鄙，沒什麼超出一般無知女性才智的內容。不過傳聞曾有奇蹟降臨在她身上，他也不敢妄加評斷……從那時候開始一直到十二個月前的聖誕節，雖然有許多關於她以及其聖潔的傳聞，但從未聽過任何神啟或神蹟，不過聽說在樞機主教在世時，[104]她曾經見過他〔指樞機主教〕與國王，但從未聽聞她對他們各說了些什麼。[105]

摩爾接著提到，在（一五三二年）聖誕節，他從李斯比神父的口中再度聽到與修女相關的消息。[106]他寫道：

> 十二個月前的聖誕節前後，李斯比神父，守規派修士，當時屬於坎特伯里（修院），有一晚住在我家。晚餐後，在他回房之前，跟我談到了修女，高度地推崇她的聖潔，表示，見證並瞭解上帝在她身上所加諸的作為令人感到不可

---

102 指的是 William Roper（c.1496-1578），摩爾的女婿，也是他的傳記作者。

103 摩爾用的是「housewife」一詞，意謂「無足輕重的女性」。

104 指烏爾西。

105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7, no. 287. 原始的第一人稱信件，參見 Elizabeth F. Rogers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Sir Thomas More* (c.1947; Freeport, N.Y.: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70), pp. 480-488.

106 摩爾這句話在時間點的說明上不甚精確。他的這封信是在一五三四年三月左右撰寫。如此推算，則十二個月前應該是一五三三年三月，但當時並不是聖誕節。巴頓是在一五三三年九月中旬被捕，所以摩爾不可能是在該年的十二月與巴頓會面。從各項線索推敲，摩爾所指的應該是一五三二年的聖誕節。

> 思議。回答說他〔指摩爾〕很高興聽聞此事。李斯比接著告訴他：她在使節[107]生前曾經見過他，也曾面見國王。她曾告訴使節關於上帝交在他手中三把劍的神啟，如果他不能善加使用，上帝將對他嚴懲。第一把劍是身為教皇的使節，指揮宗教的事務；第二把劍是以大法官的身份主持世俗的事務；第三把是運用國王對他的信任介入他的婚姻。[108]拒絕聆聽任何跟國王事務有關的神啟，相信上帝會指引他〔指國王〕，使事件在保有他名譽與王國安全的情況下落幕。針對此，他〔指李斯比〕說上帝特別命令她為國王祈禱，並提到，樞機主教的靈魂因為她的冥想而得救。之後沒再多說，就進了他的房間。未曾再跟他談過這些事務，在他一早離開後就沒再見過他，直到在聖保羅教堂的十字講壇前。[109]

摩爾的這段說明透露了幾項值得探究的訊息。首先，李斯比神父來找過摩爾。這項訊息揭示了巴頓核心成員將訊息傳遞出去的方式：如李斯比這樣的教會人士，主動拜訪相識的朝中菁英。他雖然沒有開門見山說明來意，只在臨睡前向主人告退時才「不經意」提起，但顯然不是隨興之談，因為他傳遞的內容相當完整。比較合理的解讀是，摩爾「拒絕聆聽任何跟國王事務有關的神啟」，他的態度讓李斯比一直找不到合適的開口機會。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斯比顯然與摩爾頗有私交，因為他並不是普通的拜訪，而是被主人留宿在自己的宅第；唯有相熟的友人才可能獲得這樣的待遇。可以說，巴頓集團透過如李斯比神父這樣人脈網絡廣佈的成員，將巴頓的訊息傳達給亨利王朝的核心廷臣。

李斯比不是唯一一位具有這樣人脈關係的巴頓集團成員，李奇神父也擁有相同的資源。據摩爾的說明，李奇神父也來拜會過

---

[107] 指烏爾西，他曾受命擔任教廷使節（Legate *a latere*）。

[108] 參見本文第一節。

[109] 指的是李斯比與巴頓等人在聖保羅大教堂十字講壇前的公開懺罪。*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7, no. 287. 參見本文第一節。

他：

> 大約是在懺悔節（Shrovetide）前後，李奇神父，里奇蒙的守規派修士，在接近晚餐的時間前來拜訪摩爾。在談話中，（李奇）詢問他李斯比是否告訴過他任何與「肯特郡聖修女」有關的事。回答，他〔指李斯比〕說了，而他〔指摩爾〕很高興聽聞她的美德。李奇說，他不再重述他〔指摩爾〕已經知道的，但上帝在她身上施加了許多偉大的恩典，並且透過她，加諸在其他人身上，他很樂意把這些告訴他。接著詢問，李斯比有沒有告訴他關於她去拜訪樞機主教以及三把劍的事。「有，鉅細靡遺」，我說。「他有沒有告訴你」，他說，「她獲得與國王有關的神啟？」「沒有，說真的。」我說。「他即使說了，我也不會聽，我實在不想多聽，既然她已親自跟國王當面陳告，我認為，將此事告訴我或者任何其他人都是不必要的。」當他明白摩爾不願意聆聽她關於國王的神啟後，就聊了一些她的美德，不再提及神啟。邀請他留下來晚餐，但他婉拒，往倫敦去。在這之後見過他兩次。一次在他家裡，另一次在他修院裡自己的花園。沒有談及任何與國王有關的神啟，談到其他人，有些很不可思議，有些很幼稚……。[110]

李奇的拜訪很值得討論。此次的到訪顯示他與摩爾亦相當熟稔：摩爾居住在倫敦的切爾西區（Chelsea），離里奇蒙不遠，兩人都是知識菁英，存在著私交並不令人意外。比較重要的是，李奇的談話顯示李斯比神父乃至他本人的拜會都是「有計畫」的接觸。兩位守規派修士顯然想要透過他們與摩爾的交情，將巴頓修女、她的事蹟，以及她的政治預言傳達給他。這背後自然蘊含著獲得摩爾支持，甚至延攬他進入巴頓圈子的期待。李奇的來訪讓我們確定李斯比的到訪以及他的談話並非偶然；其實，這就是李斯比造訪的主要目的。尤其值得體會的是摩爾的態度：無論是對李斯比

[110]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7, no. 287.

或者李奇，摩爾都極力避免他們提及「國王預言」的內容。摩爾為什麼阻止兩位訪客談到這項內容？顯然，這是因為「亨利八世即將去位」的預言相當敏感，摩爾不希望捲入相關的政治風暴。但如果再深入一點地分析，就會發現另一個隱晦的真相：為什麼摩爾知道相關的內容牽涉敏感？因為他已經知道巴頓預言的內容了！因為他知道李斯比等人要說的是可能涉及叛逆的危險預言，因為他知道這項預言一旦流洩出口，他就面臨後續的抉擇：要不要向亨利八世報告？[111]還是要對兩位神父的訊息表達呼應？最為微妙的是，當摩爾技巧性地阻止李斯比兩位提及國王的預言，他與兩位神父已然完成了對話：他不願意討論這個話題，自然就不會如兩人的期待成為巴頓的追隨者。李奇必已瞭解摩爾的立場，所以最後只推崇了一下修女的美德，連晚餐也沒有留下就離開了。

然而，摩爾最終還是見到了巴頓，在泰晤士河北岸的希詠修院。[112]那是一五三三年的六月。依據摩爾的說法，這是一場與修女的「偶遇」。

> 在這之後，有一天在希詠修院跟幾位神父於火爐邊閒聊時，他們告訴他她〔指巴頓〕曾經來過，提及幾件他們不喜之事，真希望摩爾曾經跟她談話。聽到她剛好再度造訪，「我過去見她，親自跟她談談。交談是在一間小禮拜堂進行，除了我們兩個沒有別人在場。我一開始就跟她表明，我來見她不是出於好奇，想知道民間傳聞，上帝啟示給她的種種，而是因為這麼多年來，每天有越來越多人談論與描述她的美好德性。我因此很想見見她，與她認識，希望她在向上帝禱告與祈願時也能夠提及我。」對於此，她給了一個非常虔誠且良善的答覆：上帝透過她所施行的作為，遠超過她這個卑微之人之所值，她恐怕許多人對她的讚譽是言過其實了。她久仰摩爾的聲名，是以早已為他

[111] 不回報的後果就會跟費雪一樣，他因為「隱匿流言」而遭譴獲罪。
[112] 希詠修院設立於一四一五年。

祈禱。[113]

關於摩爾自述與巴頓見面的原因以及景象，有幾個值得討論的地方：首先，摩爾與修女會面的「理由」。摩爾表示，他與修院的神父閒聊時，談及他們對修女不滿，希望摩爾「曾」跟她談過。無巧不巧，巴頓就在此時再度造訪，遂促成了兩人的會面。摩爾提出的理由略加推敲，就會發現其中「疑點」不少。首先，院中修士對修女的不滿為何會透過一名院外的友人傳達？當然，摩爾可能與修院的關係緊密，早已不被視為外人。然而，即使如此，我們也不得不懷疑，巴頓怎麼會如此湊巧，剛好在此時造訪修院？嚴謹一點思考就可以確定這不是場偶遇。最簡單的理由是，修女並不像修士或者摩爾這般朝中大臣，可以任意、頻繁地離開修女院；她的外出需要經過「事前的」申請與批准。稀罕出門的修女會在其它修院與「剛好到訪」的朝中大臣偶遇，這樣的機會實在不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直拒絕聆聽巴頓神啟的摩爾，竟然會在這樣的情境下答應與修女碰面，這也不合常理；他顯然已經有了心理準備。摩爾與巴頓會面屏退旁人，只留兩人單獨談話，明顯知道此事相當敏感。綜合上述線索，我們可以很確定地說：摩爾與巴頓在希詠修院的會面是經過事前的安排。希詠修院的主持人是雷諾斯神父，他是高德在劍橋時的老師。雷諾斯的學養與德性廣受推崇，修院位在泰晤士河北岸，有地利之便。這場碰面很可能就是透過他的牽線促成。[114]可能的過程是，李斯比、李奇等人並未因之前的挫折而放棄，他們最終說服摩爾以「偶遇」的方式親自面見修女，「眼見為憑」，自己判斷巴頓的為人。

摩爾與巴頓的談話內容也值得深究：摩爾完全沒有提及希詠

---

[113]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7, no. 287.

[114] 李奇的供辭中也曾提及向「希詠修院的……雷諾斯先生」提過巴頓預言，由此可知，希詠修院和巴頓的關係匪淺。G.J. Aungier 就斷定這次的會面是雷諾斯牽的線。參見本文第一節以及 George James Aungier,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yon Monastery, the Parish of Isleworth and the Chapel of Hounslow; Compiled from Public Records, Ancient Manuscripts, Ecclesiastical and Other Authentic Documents* (London, 1840), p. 84.

修士們的「抱怨」，可見前述的會面理由並不存在。而從摩爾與巴頓的互動，顯然他對巴頓的印象相當良好。尤其難得的是，透過這段記錄我們第一次真正見識到巴頓本人的神韻與舉止，不是透過他人的批評或讚美：巴頓的應對謙遜而合宜，對他人的讚譽、上帝的恩典、摩爾的推崇，每一項都回答得適切得體。她的談吐一點也不像是出身低微、目不識丁的少女；她超越出身的表現讓我們約略理解她為何能贏得如李斯比、李奇，甚至是費雪等飽學神父的信仰。

摩爾與巴頓談了些什麼？主要是一個名為艾琳（Ellyn）的少女的「靈魂出竅」：

> ……跟她談到一位住在陶特曼（Totman）名為艾琳的年輕女性，很多人談到她的靈魂出竅以及神啟。（巴頓）告訴他，她曾見過她〔指艾琳〕，告訴她她的神啟只是魔鬼的幻象，建議她將它們趕出腦海。她發現這些勸告是正確的，因為從此以後她就很少再看到異象。她〔指巴頓〕婉謝因此事所獲得的讚美，她說，上帝在少女的靈魂上施加了順從，讓她欣然地接受警告，不因她的靈魂與幻象受到非難而心生怨懟。這個回答比之前的種種傳聞更讓他〔指摩爾〕欣賞她。[115]

摩爾強調，他未曾在這次的會面中跟巴頓討論過與國王有關的預言，不過對她留下很好的印象：

> 沒跟她談到國王或任何大人物……在離開時給了她一枚金幣，請她為他及其家人祈福。未再跟她交談過，但對她留下極佳的印象。[116]

摩爾在這次的會面後就不曾再見過巴頓，但他對巴頓留下很好的評價，是以在聽聞許多關於巴頓的傳言後，特別寫了一封信勸告

[115]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7, no. 287.
[116]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7, no. 287.

巴頓謹言慎行，不要再談與國王有關的預言。[117]

摩爾為什麼寫信警告巴頓？顯然，他想要阻止巴頓惹禍上身。摩爾從一開始就刻意與巴頓及相關人士保持距離。以他對亨利八世及朝中氛圍的瞭解，必然清楚巴頓預言的危險性。但處事如此謹慎的摩爾竟然會寫信給巴頓，尤其信件是書面「證據」，難以抵賴，顯然他對巴頓的純潔與虔信相當折服，希望這位「涉世不深」的修女能夠趨吉避凶，逃過是非。

摩爾寫信向巴頓示警顯示他對修女的欣賞，而這項認知與摩爾在這封信開頭對巴頓「無知修女」的稱呼形成明顯對比。摩爾最後跟克倫威爾坦白他的「失察」，承認自己被巴頓的偽善矇騙，感謝克倫威爾揭發真相。他為自己的失誤深感慚愧，但也向克倫威爾重申，對國王絕無半分違逆之心。[118]除了向克倫威爾陳情，摩爾也直接寫信向亨利八世解釋。他在信中寫道：「聽說一紙嚴懲我的提案已由國王的御前會議提交國會」，他請國王相信，自己絕無二心。[119]

最後我們還有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摩爾既然處事謹慎，甚至與巴頓碰面都屏退外人，亨利八世如何得知他與巴頓有過聯繫？一封一五三三年未具名人士寫給克倫威爾的報告信提供了我們解答。這封信向克倫威爾交待了摩爾的行止：

> 「摩爾大人信中的措辭，上帝知道，我已經完全忘了，因為我只是粗略地讀過一遍。」認為裡面沒有什麼威脅。希望高德與該女〔指巴頓〕為了摩爾安全保存此信。推測摩爾在離開希詠後聽到一些關於她會見國王，以及對這樁令人稱賞婚姻（this laudable marriage）發出神啟的事，[120]促使他寫了那封信。在該封信中，他感謝她親切的交談，希望她為他證明，在兩人交談時他從未論及任何與君王有關

[117]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7, no. 287.
[118]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7, no. 287.
[119]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7, no. 288.
[120] 「這樁令人稱賞婚姻」指的是亨利八世與葆琳的婚姻。顯然，在當時的氛圍下，遣詞用字隨時需要小心，即使是機密的通報信也不例外。

> 的事。他希望她別因此鄙棄他的忠告……他的忠告是別將她的神啟告訴每個人，只對聖潔、虔敬的人說，別告訴世俗之人……他提到白金漢公爵（duke of Buckingham），[121]他在諮詢了一名漢頓的修士（a monk of Henton）後陷入痛苦。[122]不記得他為何提到此點。在信的最後，他希望修女將他視為最渴求她祈福之人，並且在他的能力範圍內，隨時樂意效勞。[123]

這是一封非常值得討論的報告信。依據這封信的內容我們知道，摩爾在給巴頓的信中除了重申他的敬仰與推崇外，也善意地勸阻巴頓將她的政治預言廣泛地傳播。他舉了白金漢公爵的例子為戒：一五二一年，當時英格蘭最大的貴族白金漢公爵，因被密告經常聆聽漢頓的霍普金斯（Nicholas Hopkins）修士的預言，說他有一天會成為國王，而遭到亨利八世處決。摩爾以霍普金斯的前例為鑑，示警巴頓傳告政治預言的危險。

這封信揭露了摩爾寫給巴頓書信的內容，再次證明了他對修女的善意。但更重要的是，這封未具名人士的報告信顯示，亨利八世對於摩爾的行蹤瞭若指掌：知道他曾到過希詠修院與巴頓會面（行文寫道：「推測摩爾在離開希詠後」），並且「檢視」過他寄給巴頓信件的內容。這封信，再參酌前面勞倫斯修士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亨利八世在摩爾等重要人士的身邊都安插了探子，隨時掌控他們的交遊與文書！[124]

摩爾的例子顯示，巴頓集團利用各種機會與朝中的人士接觸，而克倫威爾的往來信件讓我們見證，亨利八世政府對重要人士的言行都派有專人監控。在摩爾之外，其他關係人如費雪主教、愛塞特侯爵夫人等，也遭遇同樣的審訊與懲處壓力。他們最

---

121 Edward Stafford, 3rd duke of Buckingham (1478-1521).

122 「漢頓」位在英格蘭西南的「索美塞特郡」（Somerset）。

123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6, no.1467.

124 另一個類似的證據是，據說，羅徹斯特主教費雪在聽聞巴頓的預言時，「流下了喜悅的眼淚」。這生動的現場描述是來自勞倫斯修士給克倫威爾的報告。*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6, no.1468[5].

後都在亨利八世的要求下，表態認錯，請求原諒。

摩爾在自白中向克倫威爾辯稱他與巴頓的會面是個「偶遇」，他主要是向巴頓求證少女艾琳所見異象的真偽。費雪主教表示是巴頓修女主動上門求見，而愛塞特夫人推稱自己是被巴頓的聲名所蒙蔽。[125]姑且不論「一介女流」的愛塞特夫人是否真如她信中所稱的「無知」(simplicity)，博學多聞的費雪以及摩爾兩人無法獨立判斷巴頓的為人與言行嗎？尤其摩爾是亨利八世最初委以判斷巴頓神啟的大臣。他們或許可能被「聖修女」的言行所折服，但恐怕不會被「女騙徒」的詐術所矇混。

既然如此，摩爾等人為何做出「誤信巴頓」這樣的表述？顯然，這是出於亨利八世的壓力：懲處的文件已經送進國會，他們如果不與巴頓切割，不提出解釋，國王嚴厲的責罰就會接著執行；巴頓等人的殷鑑不遠，令人警惕。然而，摩爾等人是心悅誠服嗎？他們的說辭沒有避重就輕嗎？摩爾說李奇等人從未跟他談論過預言的內容，她與修女是在希詠修院「偶遇」！如果我們會有這樣的疑問，精明幹練如亨利八世與克倫威爾，他們會不察覺嗎？很顯然的，摩爾等人的自白有部分是囿於壓力做出的託辭，而亨利等人也明白此點。那麼，克倫威爾，乃至亨利八世為什麼沒有就此繼續追究，而是讓他們「含渾過關」？一個合理的解釋是，亨利八世在一五三四年的年中尚不打算對摩爾等人下重手，他期待摩爾等意見領袖與關鍵人士能透過巴頓案理解：所有人的言行都在國王的掌握之中，應當謹言慎行，表達順服。摩爾等人願意澄清認錯，即使理由牽強，業已表示他們無意違逆國王，對於亨利八世已經足夠。摩爾等人在巴頓案中保住性命，而亨利八世控制言論、嚇阻廷臣的目的亦已達成。

巴頓案最終在處決核心成員與審訊關連人士的雙管政策下落幕。但事後證明，關切乃至支持巴頓的人士遠遠超過那些曾與她直接或間接接觸的名單。舉例來說，一五三三年巴頓被逮捕後不久，海德修院的院長約翰就寫信給遠在加萊的萊爾夫人（Lady

[125]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6, no. 1465; vol. 7, no. 238.

Lisle, *d.*1566）。他說道：「我們的肯特郡聖修女承認了她背叛上帝與國王—這不僅是叛亂，而且是異端。她與她的同謀應該會被處以極刑。」[126]拉特蘭夫人艾蓮諾（Eleanor, Lady Rutland, c. 1495-1551）寫給父親威廉．帕斯頓爵士（Sir William Paston）的信中也提到：「聽說肯特郡的聖潔女性被御前會議審訊，『這真是我一生中所聽聞過最為驚怖之事；在這三天，最多四天之內，結果就會公告給所有人知道。』」[127]在這兩封信中，巴頓分別被稱為「我們的肯特郡聖修女」以及「肯特郡的聖潔女性」，顯然，通信的雙方都是巴頓修女隱性的支持者，即使是在她被捕下獄之後。而審判巴頓一事被拉特蘭夫人稱為一生聽聞「最為驚怖之事」，顯示亨利八世的作為已達到了威嚇的效果。最後值得附帶一提的是，在給萊爾夫人的信中稱巴頓為「我們的肯特郡聖修女」的約翰修士，就是幾天後被任命在聖保羅大教堂公開譴責巴頓及其同黨「罪行」的海德修院沙寇院長！[128]

六、結論：巴頓案的評價與意義

「巴頓案」最為弔詭之處在於我們從頭到尾無法確定「巴頓修女是否曾獲得神啟？」因為巴頓在她最後的懺罪遺言中全盤否認了之前的預言，她宣告自己「從未獲得神啟」，一切都是出於虛構！編年史家豪爾記載了巴頓的臨終演說：

> 在此，我即將受死。我不僅為自己招致了罪有應得的死亡，也造成了此時在這裡所有這些人的極刑。然而，說真的，我不該承受這麼多的責難，因為這些飽學之士清楚地知道我是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貧苦孤女—他們因此可輕易判斷我不可能做到這樣的事；他們的能力與學識從一開始就能夠判斷，他們全體都在作假。不過，因為我的造假對他們有利可圖，他們是以大大地抬舉我，聲稱一切都是聖靈

[126]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6, no. 1433.
[127]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6, no. 1438.
[128] 見本文第一節。

> 而非我之作為。我因著他們的吹捧，對自己生出了某種傲慢且愚蠢的想像，以為可以憑意捏造。這將我帶到了如今的這般田地。為此，我在此呼求上帝以及國王陛下最大的慈悲寬容，請你們所有的好心人士，為我以及在這裡與我一同受刑的人禱告，祈望上帝的憐憫。[129]

巴頓在最後的告解中否認了自己具有特殊的感應能力。她表示，一切都是出於周邊人士的慫恿與操作；他們將她塑造成聖女，獲有神啟，欺騙世人。

然而，在此同時，我們又獲得另外一種完全相反的訊息。依據伍夫（Alice Wolff）的說法：「上帝派遣的天使命令她說『這一切只是幻象』：因為時機已到，上帝將進行祂的工作。」[130]亦即，巴頓曾向外傳告，她在獄中獲得「最後一次」的神啟，而這次的神啟要她全盤否認曾得到過任何神啟！[131]究竟，巴頓修女應該被定位為天主教會所稱的「肯特郡聖女」，還是亨利政府口中的「女騙徒」？我們實在無法從她反覆的說辭中獲得定論。然而，巴頓神啟的存在與否以及「政治預言」的真相如何，都不損及「巴頓案」的討論價值。[132]

首先，巴頓案顯示，對於亨利八世的官方宗教改革，英格蘭

---

[129] Hall, *The Triumphant Reigne of Kyng Henry VIII*, vol. 2, p. 259.

[130] Neame, *The Holy Maid of Kent*, p. 239. 愛麗絲的丈夫約翰・伍夫（John Wolff）是個倫敦商人。她因為與丈夫及友人被控殺害兩名外地來的商人而下獄。依據 Neame 的說法，愛麗絲與巴頓囚在同間牢房，因此「記下」了許多巴頓在獄中見到的「異象」。關於伍夫，亦可參考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 6, no. 1381(3).

[131] Wright, *Three Chapters of Letters*, p. 18.

[132] G.W. Bernard 透過檢視巴頓反覆的說辭來探討巴頓預言的真偽以及其背後的政治圖謀。Bernard 以為柏金是整個巴頓案的主要策畫者，而巴頓本人也不能排除主動參與的意願。Bernard 表示，我們不應該「以今非古」，亦即，以今日的概念去否決巴頓「神蹟」乃至「聖女傳統」存在的可能性與影響力。見 Bernard, *The King's Reformatoin*, pp. 95-96. 關於巴頓預言的真偽，我傾向存而不論。我認為，巴頓的影響力不取決於其預言的真偽，而在於「當時人相信（巴頓）神蹟」。巴頓案是個「陰謀」，這其實是 Bernard 依據沙寇的宣講稿獲得的「官方說法」。但這是不是事情的真相，恐怕有待斟酌（如本文前面所述，連沙寇本人在巴頓行刑前都還相信她是聖女）。亦即，巴頓預言的「動機」無法透過沙寇的說辭釐清，這可能會是永遠的歷史謎題。

民間不是沒有異議聲音。這種反對之聲從肯特郡一隅的小鎮，透過教會、鄉誼，以口語及文字的形式，穿越地域、階級、乃至性別的藩籬，廣泛地傳播，連結成一股連國王都不能忽視的力量。一位目不識丁的年輕修女，透過她的神啟預言，發出了對亨利國王強烈的反對之聲！

其次，巴頓案並沒有隨核心成員的處決而落幕。亨利八世持續審訊所有關聯人士，不論層級；亨利八世給予所有人極大的壓力。他以巴頓等人的下場儆眾，讓所有人（即使如摩爾之謹慎，費雪之高潔），都臣服認錯。而尤其重要的，這後續的約談顯示亨利八世對所有重要人士的行止、交遊掌握精準；從修院中安排著勞倫斯神父，到摩爾身邊派遣檢查信件的探子，我們都看到亨利八世政府對言論掌控的廣度與深度。

最後我們可以說，亨利八世對於巴頓案的處置，展現了他對於民間言論的高度掌握與控制。由克倫威爾指揮，亨利八世在國內重要人士的身邊安插著訊息管道。掌握於事前，嚴懲於事後，雙管齊下，所有的異議之聲在亨利八世有效的打擊下，難以形成足以威脅王朝的力量。巴頓案讓我們見證到英格蘭民間的異議聲音，但也讓我們理解了亨利八世朝官方宗教改革的成功。

Elizabeth Barton and Henry VIII's Censorship on Public Opinion

Lee, Juo-yu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debate on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Present researches focus on "cooperation", considering which as the key factor for the success of "the Official Reformation" held by Henry VIII. This paper asserts that apart from coopera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English society has also expressed its opposition to the king's reformation policy. The political prophecy issued by Elizabeth Barton, the Holy Maid of Kent, was a good example. Barton, a nun living in a remote corner of Kent, by way of personal or ecclesiastical networks, disseminated her prophecy of opposition, in oral and written forms, to audience of different regions, ranks, and genders; Barton's prophecy in the end created a strong voice of opposition. Henry VIII soon went for Barton and her adherents: the nun and her "accomplices" were executed, and everyone who had ever contacted with Barton was interrogated. In Barton's Case, Henry VIII showed his close surveillance over his subjects. "To monitor beforehand and to punish afterwards", the device successfully suppressed the sounds of opposition, which can hardly formed a strong enough power to shake the regime. Barton's case reveals the voice of disagreement coming from the English populace, but it also paradoxically explains the success of the Henrician Reformation.

Key words: Elizabeth Barton, The Holy Maid of Kent, political prophecy; censorship, Henrician Reformation